

## 詩意地安居 —— 沈曾植的晚年上海生活與滬上遺老詩歌寫作

陳建銘\*

### 一、前言

廿世紀初的上海，帝國消逝，流亡謫戍卻還在進行著。

在稍早一些的年代裡，我們確曾看過類似的情景：晚明姜埰(1607–1673)遭崇禎帝譴往宣州衛，未到戍所，都城已陷落。明亡後，姜氏流落江南，自號「宣州老兵」，數欲移居宣城，以終譴戍之命；家事牽累，終不果行。臨歿，姜埰告誡子孫：「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sup>1</sup>何以酬君恩？一副流人骨。

時局遷謝，又三百年。清帝遜位，皇權及其象徵被限縮到宮牆之內，忠清者則大舉湧向民國管轄外的租界：天津、青島、上海。居滬遺老往往自號「海上流人」，<sup>2</sup>那是明遺民忠君典範的延續，更是變形：他們原不曾身負譴黜之命，「戍所」也不在蠻荒邊境，反而座落於西方列強經營的繁華都會。流人與「他者」的短兵相接，總是充滿了驚異。山東人姜埰以安徽宣州為「荒徼」，流寓江南時，席上初見「蜚蜚」，他曾遲疑不敢下箸。<sup>3</sup>在繁華的摩登上海，遜清遺老詩人遭遇了現代都市生活，行住坐

\* 陳建銘，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sup>1</sup> 魏禧：〈明遺臣姜公傳〉，載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憲(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17，頁858。

<sup>2</sup> 李詳擬為上海遺老立傳，命名《海上流人錄》，並詢及沈曾植。曾植亦有「海上流人，抱殘守闕」之自指，詳見下文；「流人」一詞，居滬遺老如瞿鴻禨、陳三立等人筆下數見不鮮，請參潘靜如：〈從中心到邊緣：民初「海上流人」的結社或雅集新論〉，《中國韻文學刊》2016年第1期，頁57–63。此外，如朱祖謀〈夢坡詞存序〉：「於是海上流人，重有滬社之課。」載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卷20，頁2119；金兆蕃〈水調歌頭·己卯上巳與同里諸君客上海者共飲酒家〉：「海上流人四集，客從故鄉來」，見金兆蕃：《藥夢詞》，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208冊，頁四下；皆為「海上流人」之例證。

<sup>3</sup> 姜埰〈赴戍〉詩自稱「荷戈荒徼去」，載姜埰：《敬亭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5冊影印清康熙姜氏念祖堂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三，頁一上。蜚蜚，一種小  
〔下轉頁148〕

臥，情況更趨複雜。帝制瓦解，倫理潰散，引發了他們的精神危機；舉目望去，西洋器物日新又新，更與遺民情懷格格不入。萬丈紅塵中，詩人該如何安置他的「一統小樓」？<sup>4</sup>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人要回應劇烈的錯位與矛盾，建構一己心安之境，首先憑仗文字與詩。創作者與新世界交接時，舊詩及其背後浩瀚的古典知識體系，提供了一個座標，一個介面，鑲嵌典故，好讓詩人藉已知聯想未知，再轉過來賦予新事物、新環境（可能矛盾、錯譯的）的意義。不同組合的挪借、嫁接，創作者的主觀選擇，如此於外在世界的藍圖上，投射、覆蓋了他們的內心景觀。<sup>5</sup>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庵、寐叟，清末民初遺老詩人之魁傑，使事奧博，屬辭瑰譎，技壓一代。清亡以後，滬上十年流寓，他調度了中國傳統文明龐雜的知識、典故、技藝，介入書寫，構築出充滿張力的摩登上海生活，「想像性的佔據」一座城市，<sup>6</sup>「詩意地安居」於其中；<sup>7</sup>而這樣的書寫與實踐，最後更反過來定義了他自身，定義世界。

〔上接頁147〕

螃蟹。全祖望〈題姜如農侍郎荷戈圖〉「虬螭話足傳」，自注：「先生至吾鄉，見鮎埼諸海錯，遲疑不敢下箸。」見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5，頁2150。

<sup>4</sup> 吳盛青謂沈曾植的樓居乃以華嚴境界，「把一統小樓變成他成就生命境界與詩學理想的道場」，部分討論材料與本文相關，十分具啟發性。見吳盛青：〈風雅難追攀：民初士人褻集與詩社研究〉，載吳盛青、高嘉謙（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24–74。

<sup>5</sup> 鄭毓瑜研究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析論其「用典所緊密牽引成的意義的界域」，如何與新世界相交接、相妥協，「正是這套舊詩體式及其背後龐大的知識體系，彷彿三稜鏡般使得所有通過它的事物，產生了意義上的折射作用，才出現如此交錯疊映的情境、曲折繁複的意味，如此可以回應古、今或新、舊的多面向寄託的『異域』、『他方』」。見鄭毓瑜：〈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的典故運用為例〉，載吳盛青、高嘉謙（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頁482–519。

<sup>6</sup> 詳參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增訂版），頁41。

<sup>7</sup> 本文標題係引用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深賞的詩人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詩句：

人充滿勞績，但還

詩意地安居於大地之上。

見海德格爾（著）、郜元寶（譯）、張汝倫（校）：《人，詩意地安居：海德格爾語要》（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年），頁91。在海德格的閱讀中，詩人主體孤立而貧困，諸神隱遁，該來的新神行跡遲遲，詩人——持存者——乃透過詩語的創建，命名一切所在其中的事物，藉此獲取穩定，達致主體安身立命的狀態。人之居也如詩。參見海德格爾：〈荷

〔下轉頁149〕

## 二、從「上海」到「海上」

西方之叩關、經營，開啟了近代上海的繁華夢。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清軍敗績，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五口依次而開。五口通商，萬國遣使，而上海獨秀。「國中之國」的租界裡，華洋雜居，這是列強的摩登殖民地，商僑的名利場，浪蕩子的銷金窟。自十九世紀中葉始，電話、電燈、自來水一一於城中安置到位。光緒二十七年(1901)，中國第一輛汽車駛入滬上街道，銀行、貿易大樓、現代商場巍巍升起。<sup>8</sup>帝國覆亡之際，十里洋場風華正盛。租界的設置，使上海百萬人得以避開清季民初一連串戰火。1910年代，外灘上繁星麗天，電燈遍地。

城市如此，城中人如何生活與感受？看遍近代上海的繁華與滄桑，學者李歐梵如此叩問：

〔外灘建築、百貨大樓、咖啡館、舞廳、公園和跑馬場，〕這些公共空間，常常是西方產物，不知中國作家是用甚麼方式在他們的實際操作或想像中把它們據為己有，而且在營建中國現代性的文化想像中把它們作為背景？<sup>9</sup>

當時的中國作家，如何在作品中描繪、理解西方現代性的洶湧而來，怎樣操刀，「把它們據為己有」，引發研究者無盡的好奇。李氏考察的對象，多是1930年代風度翩翩的新式文人，舞廳、咖啡廳、電影院是他們精神拓荒的疆域。儘管蜷居於「亭子間」，這批作家卻無所忌憚地徵用最新潮的摩登場所，以一種想像性的佔據，享用著城市空間，擴展自己的生活邊界。<sup>10</sup>

另一方面，李歐梵也注意到，半傳統的鴛鴦派作家群，與新式文人大異其趣。他們不在大街與拱廊中漫步穿梭，而大多駐足於飯店、茶樓、鴉片館，福州路兩旁的書舖，風月場中，閒茶浪酒。<sup>11</sup>然而，這些生活場景，並非鴛鴦派所能獨佔；上海

〔上接頁148〕

爾德林和詩的本質》，載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35-54。一眾遺老詩魁避居租界，亡國失鄉，驟然遭逢「現代」，那是一怪異、近乎全新的感受。此際，舊體詩人的書寫，或沉默、失語，或慘澹回應，甚至創建出一層層文字幻境，屢屢溢出傳統的形式及語言之外。於此際借西哲之靈光，察其如何築壁堅守，是否攝心安居，未必不能映照出一嶄新景觀。

<sup>8</sup> 上海在1881年設立電話局，1882年有電燈，1884年供應自來水，1901年輸入汽車。見唐振常(主編)：《近代上海繁華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240。

<sup>9</sup> 李歐梵：《上海摩登》，頁9-38。

<sup>10</sup> 李文論及現代派作家徵用舞廳、咖啡院、跑馬場、回力球場等場合，「表現他們心目中最獨立不羈的文學」。這一徵用過程並非物質上的佔有，而是「想像性的佔據」。當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像外國居民一樣享用上海的城市空間，便使自己與一個更廣闊的世界連接起來。同上注，頁41。

<sup>11</sup> 李歐梵：《上海摩登》，頁45。

風光，也絕非新潮文學英豪之禁籟。一批掌握強大文化資源的群體，1910年前後，逐漸來此落戶。那是遜清遺老。儘管諸人所居，只是李歐梵所云「上海摩登」之前身，他們亦未及見識三十年代消費文化的狂飆、各種思想與主義橫行等社會現象。然而，那城早已是異質的西方空間，如何迎拒、如何書寫，問題核心則一也。光宣詩壇諸將歇馬黃浦，他們的上海城市寫作面目獨異，精采絕倫，絕不在前兩類人之下。<sup>12</sup>以下先論其時世背景，以明脈絡。

### (一)海上流人

辛亥以後，大批遺老選擇避入租界，首要原因當然出自政治考量：西人在此轄有行政自治權及司法權，民國號令，不踰雷池。<sup>13</sup>不同租界棲息著不同人物流品：青島諸老，名位最高，也多頑固守舊派；相較之下，滬上諸老多為外官，並曾積極參與變法。<sup>14</sup>諸公袞袞佐維新，滬上遺老其實慣見滄海之闊，輪船之奇，衣袖多少沾染西潮。出人意料的是，諸老筆下的上海都市面貌，「頗亦恨枯槁」，<sup>15</sup>竟無一點浮華氣。

可以從命名窺其端倪。居滬遺老經常顛倒「上海」二字，改稱「海上」。「上海」稱「海上」，固屬常見的雅名，然依施用者身份、角度不同，意義各異。韓邦慶(1856–1894)《海上花列傳》開篇即道：「海上自通商以來，南部煙花日新月盛。」<sup>16</sup>《列傳》刊登於1892年的《海上奇書》，多涉風月之事，從命名到小說場景設置，無不引人遐想

<sup>12</sup> 關於居滬遺老的生活及精神面貌，學界已有考察，洞見紛呈。如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49–57；陳丹丹：〈「辟世欲何往，飄然海上逃」：民初清遺民的上海生活與現代遺民實踐〉，《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6期(總第33期)，頁50–59。吳盛青曾論及沈詩對都市景象的改造，見吳盛青：〈亡國人·採珠者·有情的共同體：民初上海遺民詩社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4期，頁46–61。王標由「人文地理學」的角度切入，認為租界對於清遺老而言，乃是作為異質空間(異托邦，heterotopias)的存在，見王標：〈空間的想像和經驗——民初上海租界中的遜清遺民〉，《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頁33–42。

<sup>13</sup> 此外，尚有交通、環境、謀生等不同條件考量，詳參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頁33–72，茲不贅。

<sup>14</sup> 陳毅為劉廷琛題《潛樓讀書圖》，撰五律四首。第二首詩後陳毅自注曰：「青島、天津、上海間，遺臣多居之，而青島號最盛。大學士、軍機大臣、尚、侍、督、撫皆備。」轉引自申君：《清末民初雲煙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85。青島多守舊人物，與上海諸老適成對比。

<sup>15</sup> 杜甫：〈譚興〉，載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7，頁563。

<sup>16</sup> 韓邦慶(著)，覺園、愚谷(校點)：《海上花列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

仙閨幻境。「海上」二字到清亡後，浮現更深一層的政治意涵。民國二年(1913)，李詳有意為居滬遺老作《海上流人錄》。其書未成，有〈徵事啟〉存焉，略云：

今之上海，其避世之淵藪乎！……用是仿永嘉流人之名，錄海上羈旅之士，略及辛壬以還，不涉庚己以上。謹施條目，準此縷書。異日流傳，當廁乙部。<sup>17</sup>

《永嘉流人名》，今不傳。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用該書十餘處，大抵紀錄兩晉之交公卿奔散的事跡。流人，離鄉流寓之人。李氏曾箋《世說》，必熟稔這條材料。更重要的是，此一書名與〈徵事啟〉提點讀者的，還指向江淹〈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sup>18</sup>辛亥國變，初至海上，前清大老有句曰「蓬萊水淺群真散，世上今多謫墮人」。<sup>19</sup>白頭今望，仙侶皆為淪謫流徙之群。上海之名，因此易與「海上流人」產生聯想。

青島是一個最為鮮明的對照點。青島遺老中，也有欲仿製《永嘉流人名》者，惟命名與「海上流人」不同。陳毅(1871–1929)〈題潛樓讀書圖〉：「政傳《貞觀要》，人入《永嘉流》。」自注：「憶去歲有人欲作《青島寓公記》者，是亦《永嘉流人名》之類耳。」<sup>20</sup>同樣作為遺老小影，青島諸老稱「寓公」，突出了寄人國土的遭際。他們還被呼為「島客」，沈曾植〈送章一山編修移居青島〉「島客死穿墳」，比擬高臥該地者為義不帝漢的田橫之客。<sup>21</sup>海上諸人，適得以「流人」目之，則艱難苦恨之感，俱在其中——來自中國古典的觸類旁通，不亦宜乎？<sup>22</sup>

避居海上，焉得不恨？清遺諸老集中詩例班班。鄭孝胥(1860–1938)辛亥陰曆七月入京。八月，武昌軍興，乃急馳回湖南布政使任上，途次上海，道梗不行，遂留於滬，蟄居海藏樓。<sup>23</sup>隔年所賦詩句，有「飄然海上逃」、「海上存者真子遺」、「攜

<sup>17</sup> 尹炎武：〈朱李二先生傳〉，載閔爾昌：《碑傳集補》，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999冊，卷五三，頁十六下至十七上。

<sup>18</sup> 蕭統(編)、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十六，頁三四下。

<sup>19</sup> 周樹模：〈壬子春月初至上海寓廬〉，載周樹模：《沈觀齋詩集》，收入王偉勇(主編)：《民國詩集叢刊》(臺中：文叢閣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第50冊，頁十二上。

<sup>20</sup> 見申君：《清末民初雲煙錄》，頁84–85。

<sup>21</sup> 沈曾植〈送章一山編修移居青島〉：「城葵生織布，島客死穿墳。」載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海日樓詩注》，收入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6，頁802。

<sup>22</sup> 陳丹丹：〈十里洋場與獨上高樓——民初上海遺民的「都市想像」〉，《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6年第2期，頁59：「在遺老的筆下，由於字面的相合，亦出於傳統詩歌語言與意象的慣性，『上海』這一帶有很強人為性的物質存在，每每被轉換為『自然性』的『海』、『海上』、『海濱』。」此見極是，亦點出清遺一輩折衝於繁華、蕭條的心境。然而，古典文學中遷謫流離的邊緣性，或更是斯人、斯地選用此語的核心典故。

<sup>23</sup>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增訂本)，附錄四，〈鄭孝胥年譜簡編〉，頁659–60。

拏海上成遺子」云云。<sup>24</sup>「孑遺」、「遺子」，典故出自《詩·大雅·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sup>25</sup>海藏詩境，一時皆淒清。

李詳〈海上流人錄徵事啟〉完稿後，曾寄請沈曾植指正。沈氏回札，對「流人」一名頗有微詞：

〈啟事〉文辭古雅，然「流人」之目，恐非諸老所樂聞。且永嘉有僑郡之置，有「土斷」之制，「流人」之目，因是以生。今豈有此望乎？請更酌之。<sup>26</sup>

沈曾植厭棄「流人」的緣故在於，避入上海原只是權宜之計，復國後，諸人仍要還歸故土。東晉興師北伐，勞而無功，遂將流人「土斷」入籍於諸僑郡縣，這顯然不是遺老心之所嚮。惟時久日深，復辟一夢遲遲未圓，流寓遂成了日常。陳三立（1853–1937）曾說「自辛亥之變興，流人類聚於滬濱」。<sup>27</sup>曾植雖不樂聞此二字，到了1919年，也有「海上流人，抱殘守闕，餘年何幾，顧影惘然」的自悲了。<sup>28</sup>莊子云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sup>29</sup>海藏樓上，每有二三子結伴登臨，微吟「恐是人間乾淨土，偶留二老對斜陽」；「試尋乾淨半畦土，與寄沈冥一世豪」；<sup>30</sup>蒼茫不可方物，彷彿將如此走向生命之終止。

或者應該說，國亡之後，諸老心緒紛紛轉趨守舊。流人避居海上，守志於斯，「恐是人間乾淨土」，「試尋乾淨半畦土」，皆當下所履之租界象徵。入民國後，沈曾植亦數度以「乾淨土」入詩：「龍荒已無乾淨土」、「江南竟無乾淨土」、「天壤已無乾淨土」。<sup>31</sup>乾淨土，錢仲聯注謂出自宋遺民汪立信「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

<sup>24</sup> 諸句分別出自〈張楚寶求作石老人君子居詩〉、〈題徐積餘重繪定林訪碑圖〉、〈先考功生日歸虹橋路（十月十一日）〉，載鄭孝胥：《海藏樓詩集》，卷8，頁248–50。

<sup>25</sup> 《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18.2，頁1407。

<sup>26</sup> 李稚甫（編）：〈李審言交游書札選存·沈子培先生書札〉，載蘇晨（主編）：《學士（卷二）》（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54–55。

<sup>27</sup> 陳三立：〈陳仁先詩集序〉，載陳三立（著），潘益民、李開軍（輯註）：《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00。

<sup>28</sup> 沈曾植：〈上尊號碑跋（二篇）〉，載許全勝、柳岳梅（整理）：《海日樓書目題跋五種》（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275。

<sup>29</sup> 詳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八中，頁822。

<sup>30</sup> 「恐是人間乾淨土，偶留二老對斜陽」，見〈答陳伯嚴同登海藏樓之作〉；「試尋乾淨半畦土，與寄沈冥一世豪」，見〈答陳仁先寄栽菊種詩〉；詳鄭孝胥：《海藏樓詩集》，卷8，頁224、244。

<sup>31</sup> 「龍荒已無乾淨土」，見〈曉起〉；「江南竟無乾淨土」，見〈和子修用山谷城南即事韻社作〉；「天壤已無乾淨土」，見〈寒夕口號〉，該句末字一作「雪」；詳《海日樓詩注》，卷5，頁536、634；卷11，頁1375。

家地上死」。<sup>32</sup>遺民詩語，血脈宛然。惟遜清遺老專用「土」，不用「地」，另受佛家思想影響。請參沈曾植、李翊灼(1881-1952)問答：

國變後，予以發起佛教會事至滬，適叟亦以浙亂辟居滬上。……叟奮然作色曰：「六合外寧無淨土耶？」予曰：「心淨土淨。六合之界，誰實為之？妄我見銷，客塵頓盡，淨土之名，且亦不立，何復有非淨土也？」<sup>33</sup>

亡國大夫一輩，避居海濱。淨土，當然仍指政治，以至「心淨土淨」的精神層面，如王國維(1877-1927)日後所蹈的「大清乾淨水」。<sup>34</sup>惟在物質層面上，如前所述，上海專以奇技淫巧為尚。

## (二)觀看上海的兩副面孔

城市、物質文明、欲望，從來難捨難分。鄭孝胥1909到1923年間擔任董事的上海商務印書館位於福州路(四馬路)，接壤溫柔鄉。四馬路尾，青樓如林。此處妓館為最時髦的西式建築，牆上高懸煤氣燈，各色鐘錶；屋內設置家用歐式茶几，西洋窗簾；猶如美人展示新時裝之舞臺。名妓頭戴獵人帽，身著「離經叛道的內衣」，穿梭西餐廳、跑馬場，展示體態，賣弄風姿。<sup>35</sup>遺老精神、詩語雖委頓，卻也不妨礙他們時時冶遊城中。

妓館之外，民國四年(1915)，「新世界遊樂場」開張；六年(1917)，「大世界遊樂場」落成；滬人趨之若狂。遺老一輩多涉足「新世界」，流連「新舞臺」(臺如其名，設橢圓式可旋轉的新舞臺，一切裝置，純從歐化)。<sup>36</sup>西洋奇器，雖不離日常，惟學者已注意到，眾人詩文中自覺地疏離於這座巨大消費都市之外，刻意淡化「上海摩登」。原因在於，金碧輝煌的摩登都市景觀，歌臺舞榭之樂，「可能會在潛移默化之中威脅和破壞著遺民信仰的純粹性」，<sup>37</sup>縱有五色五音，筆下且裝聾作啞。

<sup>32</sup> 《海日樓詩注》，卷5，頁536。

<sup>33</sup> 李翊灼：〈海日樓詩補編序〉，載《海日樓詩注》，頁22。

<sup>34</sup> 陳寅恪〈輓王靜安先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載胡文輝〈箋釋〉：《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增訂本)，頁45。胡箋指出王國維死前，「談次忽及頤和園，謂今日乾淨土唯此一灣水耳」(頁45)，可以參看。

<sup>35</sup> 詳見葉凱蒂(著)、楊可(譯)：《上海·愛：名妓、知識份子和娛樂文化1850-191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頁38-68。

<sup>36</sup> 郁慕俠：《上海鱗爪》(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頁27、32。

<sup>37</sup> 參見王標：〈空間的想像和經驗〉，頁39。

海上樓居，沈曾植是否也曾惑於聲色？只看其詩文、年譜，沈氏「辟地海濱，終歲樓居」；「隱居滬濱，杜門不出」；<sup>38</sup>儼然退院老僧。即使必須外出，如參與居滬遺老的題襟雅集，集會地點也總在中式林園，一種維護傳統生活方式的表態。<sup>39</sup>惟這樣的形象建構不必盡信，即使我們擱置1917年張勳復辟時老人奮身北上參與的那一場政治豪賭，視為特例；沈曾植的都市漫遊史，吉光片羽，仍能在友人集中一一捕撈。「新世界」之巔，豈不留有老人「盛氣登其頂」的足跡？下樓後，攝影留念，信乎悠遊其間。<sup>40</sup>另一名同人著作的小字旁注裡，我們還能窺見此老風懷。樊增祥〈高陽臺〉題下云：

乙庵為小子和徵詞。余嘗戲謂：此郎名字，似盲左傳中人，觀其鉛黛登場，宛然好女，惜不盡意而止，吾詩所謂「飲不及配」也。賦此索乙庵和。<sup>41</sup>

「小子和」即馮旭初(1885–1942)，字春航，上海名旦。柳亞子(1887–1958)拜倒裙下，自命馮黨，為編《春航集》，黨人推為「南方第一名旦」、「花旦之魁首」云。<sup>42</sup>樊增祥謂其名「似盲左傳中人」，絳袖朱唇，先添幾分華貴氣；「乙庵為小子和徵詞」，曾植亦馮黨中一員耶？沈氏和詞今不見，<sup>43</sup>然樊詞煞拍頗耐人尋味：「減腰圍，不獨楊枝，更有東陽。」<sup>44</sup>楊枝，指白居易伎人樊素。東陽消瘦，典出《梁書·沈約傳》：「〔約〕永明末，出守東陽。……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sup>45</sup>東陽瘦日後也被挪用至風月之思。樊詞蓋云樊、沈二老為伊銷魂。若疑增祥不必以伎自指，則似說馮、沈相思，兩人皆消瘦。無論如何，都不減「徵詞」東陽之多情。

春航之外，沈曾植還與梅蘭芳(畹華，1894–1916)有較多交集。張爾田記載：「嘉興沈子培居上海，十年不涉歌場。自畹華來滬，遂往觀劇，並作〈臨江仙〉一解，

<sup>38</sup> 「辟地海濱，終歲樓居」，見孫德謙：〈大儒沈子培序〉，載王蘧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58；「隱居滬濱，杜門不出」，見辜湯生(撰)、柯菊初(書)：〈碩儒沈子培先生行略〉，載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23。

<sup>39</sup> 關於遺老遊園，重要析論，請參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18–24。前引吳盛青〈風雅難追攀〉一文也針對清遺老之雅集有精彩的討論。

<sup>40</sup> 「與聘三、寬仲、子培、堯衢、紫東同遊新世界，子培盛氣登其頂，旋由地道出其北部。六人同攝影以紀此遊。」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德祖(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920年10月20日，頁1845。

<sup>41</sup> 樊增祥：《樊山集外》，收入樊增祥(著)，涂曉馬、陳宇俊(校點)：《樊樊山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卷6，頁1945。

<sup>42</sup> 詳參柳亞子(編)：《春航集》(上海：廣益書局，1919年)，頁7、12。

<sup>43</sup> 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曼陀羅寢詞》，收入《沈曾植集校注》，頁1511錄〈高陽臺(借月滄愁)〉一闕，為光緒二十二年(1896)沈氏為文廷式革職離京作，與此題無涉。詳見文廷式(著)、何東萍(箋注)：《雲起軒詞箋注》(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頁183。

<sup>44</sup> 樊增祥：《樊山集外》，卷6，頁1945。

<sup>45</sup> 《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13，頁235–36。

時人以為難能。」<sup>46</sup>所謂「不涉歌場」云云，相關記載不只一見，但都未必可信。<sup>47</sup>樊山豔詞〈高陽臺〉作於1912年秋冬之間，<sup>48</sup>檢相關材料可知，1914年梅郎二度來滬的接風宴、滬上富商甘家花園的大宴，曾植都是座上陪客。梅蘭芳回憶1914年12月7日登臺前的接風宴，細節十分生動：

座中大半是當時留住上海的幾位舊學湛深兼長書畫的老先生，如朱古微、沈子培、吳昌碩……。他們那天的興致都好，談鋒也很健。我看見沈先生把他新填的一首詞，念給朱先生聽。他們兩位還細細地推敲裡面填的字眼。<sup>49</sup>

梅郎以照片贈海上名流十三人，署雙款曰：「某某先生留念。梅瀾謹呈。」<sup>50</sup>曾植居其一，並撰〈臨江仙〉回贈，自注曰：「綴玉軒主留贈小影，賦此以答。」<sup>51</sup>上海名流開「香南雅集」，「特約陳散原、沈乙厂二公」，蘭芳乞得沈氏墨跡，離滬之前，更曾登門話別，見諸《申報》。<sup>52</sup>諸老中「愛梅」者，首推況周頤（1859–1926）。況氏將「歷次貽贈畹華之作」匯刻一書，命名《秀道人修梅清課》。曾植為其題詞，冠於書首。<sup>53</sup>陪宴、觀劇、與會，寫真小影和清詞麗句的一往一來，出入梨園，足跡可尋，夫子何嘗不動心？

<sup>46</sup> 張爾田：《近代詞人逸事》，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附錄，「詞林新語（三）」，頁4371。

<sup>47</sup> 趙叔雍（尊嶽，1898–1965）〈人往風微錄（八）：沈曾植〉，甚至說「梅蘭芳譽演海上，請往顧誤，欣然命駕，蓋數十年不入歌場者」，見《古今半月刊》第33期（1943年10月16日），頁13。

<sup>48</sup> 《樊山集外》編年有序，〈高陽臺〉詞前十首為〈鵲橋仙（壬子七夕）〉，後三首為〈慶宮春（十月十二日夜半）〉，再後數八題為〈齊天樂（癸丑元夜）〉，則〈高陽臺〉作於1912年壬子秋冬之間可知。

<sup>49</sup> 梅蘭芳（述），許姬傳、許源來（記）：《舞臺生活四十年》（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1年），頁222。甘家花園宴梅事，見劉豁公（編）：《梅郎集》（上海：中國圖書集成公司，1920年），卷7，頁6–7。

<sup>50</sup> 梅蘭芳寄贈照片的細節，見〈梅訊（三十九）〉，《申報》，1920年5月23日（第16973期），第14版。

<sup>51</sup> 沈曾植：《曼陀羅寢詞》，頁1538。

<sup>52</sup> 邀賓事，載〈梅訊（二十八）〉，《申報》，1920年5月12日（第16962期），第18版。求書事，「沈乙盦先生書法，當世稱寶，畹華輩莫不求作少許，以為紀念」，載〈梅訊（三十一）〉，《申報》，1920年5月15日（第16965期），第14版。話別事，「畹華今日下午至各處辭行，凡曾荷投贈諸名士：吳昌碩、何詩孫、王息存、沈子培、鄭海藏、汪鷗客、朱古微、況夔笙，皆一一登門話別」，載〈梅訊（四十一）〉，《申報》，1920年5月26日（第16976期），第18版。

<sup>53</sup> 事見鄭煒明、陳玉瑩：《況周頤年譜》（濟南：齊魯書社，2015年），頁454–55。曾植〈修梅清課題詞〉二首云：「如聞秀鐵面，還作空中語。索笑苦巡簷，吳歌常爾汝。」「雪北香南去，聲塵湊極微。江風無限浪，吹起野雲飛。」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卷18，頁1925。錢仲聯《沈曾植集校注》失收。

滿足了聲色之娛，也要饜足口腹之欲。滬上菜館林立，除原有的徽州、寧波、蘇州館三種，天津、金陵、揚州、廣東、鎮江諸館，乃至四川、福建館，漸漸開設，包羅海內精華。菜館價格或低或高，一餐索價銅元二十枚到數十金不等，不同階層，各取所需。沈曾植等遺老多為前清大僚，聚會宴飲自有要求：

四川福建等館，均於光復〔指1911年11月3日「辛亥上海光復」〕後始開設。蓋當時遺老叢集滬上，如樊樊山、易實甫、沈子培、李梅菴諸輩，文酒風流，均集於小有天、別有天、醉謔齋、式式軒諸家，而閩蜀菜館之名因之大噪。士夫商賈之請客者，意非此種菜館，不足以表盛饌。每筵之價，需十金以外。<sup>54</sup>

總上可見，花不著身，豈是易易？鄭孝胥詩〈市樓有號新世界者，八月十四夜與聘三、錫之、鑑泉共飲翫月〉，寫及上海，頗值得一提。詩云：

醉中惟覺燈光熱，暗處方知月色清。萬戶市聲散空闊，九天夜氣入新晴。同遊骯髒應相許，舉世披猖信可輕。穿盡人羣聊睥睨，放歌還欲拊簷楹。<sup>55</sup>

本詩最可玩味者乃頸聯。「同遊骯髒應相許，舉世披猖信可輕」，骯髒，高亢剛直貌，與七句之「睥睨」相呼應。明人李夢陽詩云：「時人固不識，古志益骯髒。試觀同遊子，魄盡盡英行。」<sup>56</sup>即以己「骯髒」之志，與「同遊」者相高。研究者曾謂此句為鄭孝胥「對骯髒塵世的抱怨」，<sup>57</sup>意思、音韻皆未通（該詩第五句四字應仄，亢直之「髒」，上聲；不潔之「髒」，平聲）。不過，「新世界」原來象徵西式欲望及逸樂，物慾橫流，百戲雜陳。若姑且從此誤讀，「同遊骯髒應相許」句於作者本意外，也可「藏污納垢」；相許同遊，鄭生愛此敗德之樂園——海藏樓主人不會不知道。滬濱在外地一些遺民眼中，是個腐敗顛覆的「萬惡所萃」地。<sup>58</sup>然而，亦無妨。此老向來雄奇自喜，不避罵名。既是「中外互市之所，土薄而俗偷，奸商傀儡，鱗萃鳥集，妖言巫風，胥於是乎出」之惡土，又是遺老「隱忍而出此」、「沈冥而不反」的方便居所，<sup>59</sup>矛盾極矣。但誠如論者所云，經歷巨變的時代，惟有詩，能緊密交錯並置相矛盾的元

<sup>54</sup> 梅生：〈上海菜館之今昔〉，《申報》（本阜增刊），1925年11月10日（第18930期），第1版。

<sup>55</sup> 鄭孝胥：《海藏樓詩集》，卷9，頁265。

<sup>56</sup> 李夢陽：《空同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2冊，卷十二，〈九子詠九首·馬進士君卿（錄）〉，頁三上。

<sup>57</sup> 見陳丹丹：〈「辟世欲何往，飄然海上逃」〉，頁52。

<sup>58</sup> 參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頁50。

<sup>59</sup> 見王國維：〈《疆村校詞圖》序〉，載王國維：《觀堂集林》，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卷8，頁620-22。王國維此段關於滬上生活的描述，頗能透露遺老遷居海上的複雜心態。

素，包容「難以調和甚至不可能調和的複雜和衝突」。<sup>60</sup>「骯髒」，可以代表抗拒或擁抱，一句詩語的誤讀，不經意展現了清遺老面對現代性的兩張面孔。

回頭看詩首句，鄭孝胥於「新世界」所見，先是燈光。是日日記：「過丁衡甫，遂過鑑泉，遇王聘三、劉錫之，同至新世界共飯，燈月交輝，甲於滬上。」<sup>61</sup>檢閱《海藏樓詩》，燈字凡五十餘見，多為「殘燈」、「霜燈」，或請來陪襯燈前人事。「燈光」的燦爛熱烈，僅此一見。上海街市萬燈輝煌，滬上奇觀，至今才鱗爪一露。不及一個月前，陳曾壽登樓望月詩：

彈指虛空不夜城，市煙海氣漫縱橫。更無燈火闌珊處，卻與何人共月明。<sup>62</sup>

燈光燦爛的不夜城，陳氏謂：傳統語碼「燈火闌珊」之意境，不可覓矣。此地有海氣縱橫不足怪，然而，夜半何曾有「市煙」？也許，那是霓虹燈光朦朧吧。煙者，氣也。古人以雄為虹，雌為霓，天地之淫氣；氤氳不正，象徵淫逸、混亂。<sup>63</sup>摩登時代的霓虹，是茅盾（沈雁冰，1896–1981）初到上海所見的電管，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Light, Heat, Power!”<sup>64</sup>儘管「海上流人」諸作屢以舊詩語暗示心境枯槁，上海能量之縱橫漫溢，似有文字縛不住者。

### 三、樓居：藏城市於林壑

辛亥陰曆八月，武昌革命軍興；十月中，江寧失守。沈曾植聞訊力疾至滬，圖謀挽救。十二月廿五日，宣統帝下詔遜位。海上流人順隨明清之際士人「不入城市」的悔愧形象，以詩歌建構一幢幢人煙罕至、聲色虛寂的寓樓。

唐人曰：「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sup>65</sup>寺名靈隱，寂寥天臺。曾植所居的海日樓座落於十里洋場。海日樓主人顯然不願於詩詞裡沾染繁華，那麼，該如何消納城市的聲色與欲望？號稱不入城，不足為奇。奇之又奇者，遺老詩人竟能透過「詩眼」，將寓樓藏於山林丘壑中。首陽山，王官谷，市塵中正好供吾安居。

<sup>60</sup> 田曉菲：《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頁262。

<sup>61</sup> 《鄭孝胥日記》，1915年9月22日，頁1579。同年另有8月9日，頁1573：「車過泥城橋，望新世界如舞龍燈，拖尾甚長，昂頭天半」；8月17日，頁1574：「過新世界，登頂，俯跑馬廳，一碧可喜」等記載。

<sup>62</sup> 陳曾壽：〈七月十五夜登海上最高樓看月〉，載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2，頁73。

<sup>63</sup> 《淮南子·泰族訓》：「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霓見。」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20，頁1375。

<sup>64</sup> 茅盾：《子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3。

<sup>65</sup> 駱賓王（著）、陳熙晉（箋注）：《駱臨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1版），卷5，頁190。

### (一)城中之山

民元春夏之交，沈曾植寓居英租界直隸路，有一首數十字詩題之作。題曰：

旅居近市，鬱鬱不聊。春夏之交，霧晨延望，萬室濛濛，如在烟海，憬然悟曰：「此與峨嵋黃山雲海何異？」汪社耆持此圖來，乃名之曰「山居」，約散原同賦。散原先成，余用其韻。<sup>66</sup>

此詩賦詠汪洛年（社耆，1870–1925）《山居圖》（又稱《海日樓圖》）。根據記載，為沈氏繪《海日樓圖》者，除洛年，至少還有吳昌碩、顧鶴逸（1844–1927）、夏敬觀（1875–1953）等十多人。<sup>67</sup> 寓目所及，諸人畫作皆似山居，煙霞丘壑，獨立世外；其中夏敬觀畫跋更徵引曾植語：「萬屋濛濛，如在煙海。」<sup>68</sup> 林海內外，夏氏果真點染三十餘屋舍，遙接上方雲霓：



夏敬觀《海日樓圖》手卷。設色紙本。29.2 x 77.6 cm<sup>69</sup>

該題錢仲聯注引沈氏〈余堯衢參議德配左夫人古希偕老圖序〉，進一步申明其意：「昔余初至此邦，嘗作《山居圖》寓意：以途人為魚鳥，圓圓為峯崎，廣衢為大川，而高

<sup>66</sup> 《海日樓詩注》，卷4，頁452–53。標點為筆者所增。

<sup>67</sup> 李宣龔〈題顧鶴逸為沈寐叟所繪海日樓圖〉序云：「是圖之作者，不下十數輩。」見李宣龔：《碩果亭詩續》，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06冊，卷二，頁七下。

<sup>68</sup> 中國嘉德2009年拍賣會（編）：《中國近現代書畫（一）》（北京：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2009年），拍品第698號，無頁碼。

<sup>69</sup> 同上注。曾植原文作「萬室濛濛」，敬觀引作「萬屋濛濛」。

囟為窳堵波。」<sup>70</sup>上海街上途人熙攘，曾植視為魚鳥，一往一來，率皆隱者嘉友。圓圍，市門。市門為峰，當指遠方商業大廈畫下的天際線。馬路是大川，足以容納魚鳥盤旋。租界內工廠高囟，詩人心中翻為梵語之佛塔 (*stūpa*)；市塵居，亦可一學摩詰「山中習靜」也。<sup>71</sup>

海上何曾有山？山只盤在此老胸中。沈詩首先必須辨明此意。詩其一，首段十二句云：

山居不識山，宅相乃非宅。心精一回瞀，萬象轉朱碧。以馬喻馬非，騎驢孰驢覓。茫碣毗嵐風，墮我群魔窟。牢守顛當門，歧緣蜥蜴壁。遼海八尺牀，堅待穿當膝。<sup>72</sup>

「山居不識山，宅相乃非宅。」上句錢注引蘇軾〈題西林壁〉：「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sup>73</sup>樓上人，竟不知身在山中耶？甫落筆，即模糊了城市山林之界限。下句「宅相」，錢注引晉人故事，解作住宅風水之相，<sup>74</sup>有誤。此處依字面讀即可：海日樓宅，貌為樓宅，即非樓宅。沈曾植佛學深邃，本句法力，即從貝葉文字中來。《金剛經》云：「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sup>75</sup>

宅有宅相，即非宅也，宇宙萬有皆由識神變現。「心精一回瞀，萬象轉朱碧。」上句仍用佛典，錢注引《楞嚴經》：「心精徧圓，含裹十方。」<sup>76</sup>蓋云萬法由一心而生，一心所攝。瞀，眼花撩亂。心方定，眼一睜，竟又「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sup>77</sup>詩人眼中，萬象皆不穩定，等待重新定義。若落實來說，「朱碧」又能指朱樓碧瓦；朱碧既轉，第宅亦將散為萬象。

詩首僅用四句二十字，拆卸高樓，以下再剝其膚。「以馬喻馬非，騎驢孰驢覓，茫碣毗嵐風，墮我群魔窟。」非馬非驢，拒斥名稱之後的任何定義，詩人復借來一陣

<sup>70</sup> 《海日樓詩注》，卷4，頁453。沈氏〈缶翁詩序〉也有類似表述，見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海日樓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9年），卷1，頁69，茲不贅引。

<sup>71</sup> 王維〈積雨輞川莊作〉：「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載王維、孟浩然（著），曹中孚（標點）：《王維全集（附孟浩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10，頁55。

<sup>72</sup> 《海日樓詩注》，卷4，頁453-54。

<sup>73</sup> 同上注，頁453。

<sup>74</sup> 同上注。

<sup>75</sup> 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頁七五二下。

<sup>76</sup> 《海日樓詩注》，卷4，頁453。

<sup>77</sup> 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載張溥（輯）：《王左丞集》，收入《重校精印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上海：掃葉山房，1925年），第39冊，頁十四下。

罡風，吹壞世界——錢注引《大寶積經》「此三千大千世界，為毗嵐猛風之所吹壞，一切散滅，無有遺餘」，<sup>78</sup>是也。樓居無相，以蟲名之，隱隱帶出山野草澤之氣：「牢守顛當門，歧緣蜥蜴壁。」顛當，一種蜘蛛。顛當守門，蜥蜴緣壁，物類各有特性。這裡顛倒了語序，一舉一動，彷彿都是詩人所為。此老深坐門戶中，靜待變化。

城市退隱，城市瓦解。次段十二句，句句召喚山林川澤之相。

土垢變之淨，法雲聞自昔。饗朽倒為香，逢子原非疾。反覆究陰陽，居遊皆木石。吾朝禮姑射，冰雪照肝膈。吾夕遊華胥，鳥獸絕迹迹。市聲濤共瀉，心月眼有食。<sup>79</sup>

欲令「土垢變之淨」、「饗朽倒為香」，關鍵在人怎樣體察。「反覆究陰陽，居遊皆木石」，老人於霧晨反覆觀之，兩眼昏花，忽地靈光一閃，所見頓時示現為山川鳥獸之跡。錢注引《孟子》：「舜之居於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sup>80</sup>詩人愛其居遊往來，原不措意於典故背後聖人見善，「若決江河」之心。<sup>81</sup>城市樓居化作山林，沈氏所以能臥遊其中，朝禮姑射，夕遊華胥，偕神人、黃帝而飛行；耳中市聲成濤，心月孤圓無染，一片琉璃心。

日後再寫樓居，詩云：「雲海迥留詩眼在。」<sup>82</sup>拈出「詩眼」，不恃肉眼；願借文字移山倒海，安頓居所地境與遺民心境。此時季節：春夏之交。氣候：有霧。詩人反覆體究陰陽，拆解磚瓦，召喚木石，終將城市藏於山林。這個行為幾乎有哲學的高度——「存在」其間。<sup>83</sup>

山居神遊，詩人既與鳥獸同群，也與同人，時時相往來。末段八句，友人身影浮現，是酬唱詩歌的曲終奏雅：

即此造商顏，何曾耳班翟。善來子陳子，分我白鷗席。天宇迥寥泐，方隅無閼隔。東望雲海空，或有騎鯨客。<sup>84</sup>

<sup>78</sup> 《海日樓詩注》，卷3，頁305。

<sup>79</sup> 同上注，卷4，頁454。

<sup>80</sup> 同上注。

<sup>81</sup> 《孟子·盡心上》：「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十三上，頁423。

<sup>82</sup> 沈增植：〈和藏翁寄贈海日樓春宴圖詩韻〉，載《海日樓詩注》，卷7，頁860。

<sup>83</sup> 海德格爾的哲思雋語，永遠讓人想得更多一些。他說道：「詩是真正讓我們安居的東西。……但是，我們通過什麼達於安居之處呢？通過建築 (building)。那讓我們安居的詩的創造，就是一種建築。」見海德格爾 (著)、郜元寶 (譯)、張汝倫 (校)：《人，詩意地安居》，頁89。沈增植「山居詩」之拆毀與建築，彷彿相似。

<sup>84</sup> 《海日樓詩注》，卷4，頁454-55。

詩歌末段，山巔水涘之間，有人騎鯨而來。騎鯨，本喻隱遁或游仙。中國古典中最著名的騎鯨客，莫如李白，而太白另有縱橫捭闔的策士形象：「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鼇客李白。」<sup>85</sup>騎鯨客，同時也能是釣鼇客。沈氏選用此語，隱逸與政治意涵便可同時並存。此題散原先成，沈氏前後連疊四韻，同人如樊增祥、陳衍（1856–1937）、楊鍾羲（1865–1940）等皆有和詩。鄭孝胥為另賦《山居圖》詩，末四句頗耐人尋味：

吾儕即山鬼，能知一歲事。相攜山之阿，風雨娛晝晦。<sup>86</sup>

儘管不能役使鬼神，吾人尚有小神通——預卜後事。（雖只「能知一歲」耳。）鄭孝胥詩語隱隱挾帶風雷。《史記·秦始皇本紀》：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涓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sup>87</sup>

鄭詩「祖龍死」云云，隱然劍指袁世凱。莫忘遺老乃民初政局之覆雨翻雲手，軍閥幕中，往往有人走報消息，上下其手。倒袁，本是圖謀復辟的一環。<sup>88</sup>傷時避世之外，這裡又指示了居滬遺老的另一重可能：山鬼，一點逍遙，一點躊躇。

## （二）城中之谷

城市居，大不易。1890年代之後，上海人流匯聚，租界內外遂鬧起了「房荒」。<sup>89</sup>1911年夏，沈曾植曾住直隸路、戈登路，隨後移向虹廟街。隔年七月，沈家移居麥根路11號。詩人〈移居〉云：「向去立錐甯卜度，適來華屋且生存。」<sup>90</sup>自稱「華屋」，可知

<sup>85</sup> 趙令時：《侯鯖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與《墨客揮犀》、《續墨客揮犀》同本），卷6，頁151。

<sup>86</sup> 鄭孝胥：〈沈子培屬題山居圖〉，載鄭孝胥：《海藏樓詩集》，卷8，頁230。

<sup>87</sup>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6，頁259。

<sup>88</sup> 新舊風氣雜揉之際，清遺老對復辟、袁氏稱帝事意見不一。鄭孝胥、沈曾植等人堅決反袁，意在復辟。有一條革命黨與清遺老共謀的材料，可以略窺一二：「康南海（有為）、鄭蘇戡（孝胥）、沈子培（曾植）、瞿子玖（鴻禴）、馮夢華（煦）、余壽平（誠格）諸公，罵袁最痛切（晤南海時，鄭叔問焯在座，相與款接，問余倒袁後，國政是否請宣統皇帝出來。余曰：「倒袁一事，復辟又為一事。余革命黨人，復辟未敢苟同。」南海解之曰：「君等戮力倒袁，後事再說。」）。」李根源：《雪生年錄》，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5冊，卷二，頁十一上。

<sup>89</sup> 詳參張生：《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sup>90</sup> 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頁370。此句今本作「劍首唐虞無起滅，卮言凡楚有亡存」，見《海日樓詩注》，卷4，頁474。

絕非陋室。1914年底，沈曾植一家遷往44號，屋舍更加寬闊，月租六十元，可供一家舒適安居。論者據沈曾植家書，指其手頭拮据，滬上居屋狹小，<sup>91</sup>似不準確。可惜好景不常，1918年10月，沈氏舉家搬往威海衛路210號，踰縮一椽，兩旁有高樓矗立。老人致函羅振玉(1866–1940)云：「新居如在壑谷之中，坐井觀天，名之曰『井谷』，不復得稱海日樓矣。公有暇，試為吾作〈井谷記〉以遣悶，何如？」<sup>92</sup>又倩陳衍作一文。陳氏為撰〈谷隱記〉，<sup>93</sup>主人乃自號谷隱居士云。<sup>94</sup>

鄭孝胥過訪海日「山居」，數度記曰「〔子培〕所居極不潔淨」；「過子培，其居蕪穢不治，垢面，擁裘坐亂書間」；<sup>95</sup>非前引詩章的逍遙仙境可比。谷中狀況，更加不堪。1919年元月，上海流行性感冒盛行，沈寓上下病倒十多人，曾植長媳甚至因此一命嗚呼。半年之內，時疫一再爆發。六月，沈致函妻弟兼親家李傳元，云：

威海衛書齋，命之曰「井谷山房」，幽闇可想。久居穀中，日益蹉跎，目眊眊其凝盲，聽肅肅而無聲。精神日墮(亦是類墮，亦是隨墮)，病菌日滋。遂感疫氣，災及玉女，則持誦之力不足也。兄七十之年亦染疫氣，亦不得謂非懈怠之故。四月復病，六月復病，深有志不攝氣之懼。<sup>96</sup>

<sup>91</sup> 關於麥根路44號住所環境，沈曾植致吳慶坻函云：「弟去月十三移居麥根路之四十四號，屋舍略寬。」見沈曾植(撰)、許全勝(整理)：〈海日樓書翰·五十〉，《歷史文獻》第五輯(2001年)，頁16。沈曾植初至上海，致函夫人云：「昨來此得橘〔李傳元字橘農〕書，甚願合租一屋避暑，……此事須鄙歸後面盡曲折，大約二十前後鄙必歸。辛園房究嫌狹窄，不如五弟行後接租此間屋也。」見許全勝(整理)：〈海日樓家書·一〉，《歷史文獻》第六輯(2004年)，頁190。學者朱興和據云：「從信中可知，他想租賃的房屋非常狹小，而且還精打細算，希望能和妻弟李傳元合租，可見經濟上很不寬裕。」見朱興和：《現代中國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詩人群體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頁161。朱說不確。沈氏並未承租家書中嫌為狹窄的辛園房，合租亦非其首選。曾植1912年至1918年所居的麥根路海日樓，月租六十金，較之他處僅須二、三十元到五十餘元者，已屬舒適。參觀〈王國維致羅振玉(1918年7月30日)〉函可知：「〔哈同路〕最大之三幢屋，有五十餘元一所者，餘價不等，以大小為差。後丁輔之來云，彼所租之屋月四十元，其里中之屋，不過三十五元左右。……乙老之屋月六十金，如有此種屋，則公之全眷與書器亦略足容。」見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399。

<sup>92</sup> 沈曾植(撰)、羅繼祖(整理)：〈海日樓遺札〉，《同聲月刊》1944年第4卷第2期，頁99。

<sup>93</sup> 陳聲暨、王真(編)：《石遺先生年譜》，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77冊，卷六，頁二一上。

<sup>94</sup> 王遽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頁71。

<sup>95</sup> 《鄭孝胥日記》，1912年7月27日，頁1426；1917年12月10日，頁1697。

<sup>96</sup> 沈曾植：〈寄訐齋(己未)〉，載沈曾植：《海日樓手簡》，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年間抄本，無頁碼。

《易·困》之初六：「入于幽谷。」<sup>97</sup> 沈氏自謂困於幽闇小樓，眼不見物，耳不聞聲，精神日墮。所幸，此際他留下了幾首詩，指示了超越的可能。遣悶命名，賦詩作記；何以解憂？惟有文字。

「城中之谷」首次入詩，見於〈井谷山房夜坐〉。詩云：

不能晨夜復如何？卧即惺惺坐欠呵。落月照梁常在影，清江入海不還波。有樓且可聽羌笛，無字誰能辨魯戈。鼠穴牛車鎮常見，樂家論與評疑謫。<sup>98</sup>

此詩首聯描繪老人作息：臥時不寐，白晝欲眠，「不能晨夜」如畫。落月滿梁，清江入海，寫景平易可親。腹聯一轉，兼敘情志：樓上人聞羌笛橫吹，無關邊情、閨思。沈氏樓居近市，大概有西洋「胡樂」亂耳吧？六句「無字誰能辨魯戈」，殊不易解。錢注徵引兩事，一為沈作喆《寓簡》記虞世南（558–638）為唐太宗捉刀提筆，魏徵（580–643）鑑裁如神，辨別真贋：

唐文皇帝妙於翰墨，常病戈法難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虞永興填之，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鄭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戩』字戈法乃逼真。」太宗驚歎。學之精，鑒之明，乃至於此。作字尚爾，況於修身學道？為國為天下立大事，而可以苟簡鹵莽姑息而為之，有不敗者乎？鄭公之鑒裁，可謂入神矣。<sup>99</sup>

此典可釋分辨「戈」字。然而，虞世南，越州餘姚人，與魯地並無關聯。錢注於是更引《抱朴子》：「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sup>100</sup> 指傳鈔錯寫，引發誤讀。此典可釋分辨「魯」字。這樣一來，沈句應讀為「無字誰能辨『魯』、『戈』」。不過，此解不免牽強。我們不妨再進一步問：兩典是否有融而為一的可能？又與谷中夜坐的老人有什麼關係？

究其實，錢注乃是「略其殷頑之跡」的刻意避忌。<sup>101</sup> 該句古典、今典皆未擒出。沈曾植於太宗作書故事插入一「魯」字，表面上與「魯魚亥豕」有關，實則兼用「魯陽

<sup>97</sup> 《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5，頁228。

<sup>98</sup> 《海日樓詩注》，卷10，頁1228。

<sup>99</sup> 沈作喆：《寓簡》，《叢書集成初編》排印知不足齋叢書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9，頁74。

<sup>100</sup> 《海日樓詩注》，卷10，頁1228。

<sup>101</sup> 錢仲聯先生在其沈詩箋注〈前言〉，謂「詩中所流露的封建忠君思想，完全是封建性糟粕，這裏不加刪去，一則便於從全面的角度予以批判，一則從資料的角度予以保存」。見錢仲聯：〈前言〉，載《沈曾植集校注》，頁6。然而，綜觀全書，錢注仍有刪削避忌處，如刪去《海日樓詩》清亡以後保留的宣統年號，多次強調主張曾植北上參與張勳復辟乃為人挾持云云。種種作法，毋寧更接近他在《沈曾植集校注·自序》中勸告讀者的（頁5）：「略其殷頑之迹，挹其古芬之詞可也。」錢注精審，是作為閱讀《海日樓詩》絕佳橋樑，卻也因其意識形態，帶來了不少遮蔽。

揮戈」之典。《淮南子·覽冥訓》曰：「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日為之反三舍。」<sup>102</sup>陽公慶戰於韓，日暮途窮，以戈指天，其精誠竟可以逆天反地，轉夕照為中天。城市山谷裡，遺老圖謀清室再興，心嚮往焉。至於遷居跟這一典故的關係，仍要從書藝尋覓。沈曾植有「顏其居」的習慣，大書齋名，榜於門上，如其「題目寓樓曰海日樓」。<sup>103</sup>居於麥根路時，他曾變「麥根」為「木根」，「書之貝葉箋，結以枯蘭佩」（詳細討論，見下一小節）。<sup>104</sup>日後再遷新開路辛家花園，沈家門上也有「鴛湖沈寓」之貼。<sup>105</sup>搬家諸事忙亂，援筆題名一事，大概還來不及料理。這名詩人兼書法家說：吾未「顏其居」——還沒寫上匾額，即詩中所謂「無字」——誰復認字認人，識得此地有願執魯陽戈者？

末句「鼠穴牛車鎮常見，樂家論與諍疑諷」，扣著井谷山房，奇想聯翩。錢注引《世說》記衛玠問夢，樂廣曰：「是想」，所以不曾夢見「乘車入鼠穴」。<sup>106</sup>詩人反詰：高樓環伺的井谷山房，寧非鼠穴？鼠穴依城社，有車鎮日出入，是要與樂令爭論一番。我們記得，「夢」、「夢事」、「草間之夢」，原是沈曾植與同人復清的隱語。<sup>107</sup>如果結合詩下半看，雜家者言揮戈返日，難以想像，惟精誠所至，竟成其事。曾植此詩賦於丁巳清帝復辟失利之隔年，遺老夜坐不寐，心存魯戈，勤勤懇懇。那麼，陰闇的幽谷也可以一變為暘谷。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期待一陽來復。

同卷下一題詩〈井谷夜觀〉云：

坐井觀天不自量，窅然身世閻門藏。三星一月成心印，四供雙身發智光。直向坤乾覘變復，部居甲子應時方。（時方讀莊氏《說文》。）峨峨天極環中在，親見羣仙鸞鳳翔。<sup>108</sup>

全詩藻飾以釋典洞笈，群仙列宿，初看不明所指。同樣是腹聯透露了消息，六句「應時方」，說明井谷方位、詩作撰就之期。錢注引《說文》曰甲，屬東方；子，十一月。<sup>109</sup>沈家遷居井谷，時在戊午十月。此詩大約作於一個月後。《說文》又曰：「十一

<sup>102</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卷6，頁447。

<sup>103</sup> 《海日樓詩注》，卷5，頁696。

<sup>104</sup> 同上注，頁710。

<sup>105</sup> 李詳：〈記與沈子培先生訂交事〉，載李詳（著）、李稚甫（編校）：《李審言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967。

<sup>106</sup> 《海日樓詩注》，卷3，頁375。

<sup>107</sup> 《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259、290、296、310、371。

<sup>108</sup> 《海日樓詩注》，卷10，頁1228-29。

<sup>109</sup> 同上注，頁1229。

月，易氣動，萬物滋。」<sup>110</sup>在這一聯詩中，「變復」就不只是錢注所引天人感應體系下的禳災厭勝。復，兼指天道剝復。老人祝禱國運再興，關懷正與上一題詩相同。

除了勤勞王事，以天心破除晦暗，亂世交誼，也能令幽谷放光。1919年三、四月間，沈氏門人謝鳳孫寓於井谷山房，師弟相聚歡欣。臨別前，沈曾植有贈行詩〈三月石欽自西湖歸寓井谷山房者匝月，傾談極樂。四月之望，將謁散原於金陵而歸。久聚惜別，賦此贈行〉數首，其三曰：

三歲再相見，世囂神益定。心源一字師，潛入無窮境。晝夜放渾渾，往來通井井。勿言荒江濱，呻訊壁燈冷。文字劫方興，天樞挈先醒。悠游積微著，憂患鬱觀省。室闇夜氣澄，談深月樞爛。千秋罔象珠，灼爍窺光景。老友共商量，庶幾殘燭炳。愴然執手別，遠跡超湖嶺。想見到家時，園花復春穎。<sup>111</sup>

井谷於此翻為好名：「晝夜放渾渾，往來通井井」。《易·井》卦辭：「往來井井。」<sup>112</sup>即使歲月遷流，井德仍然潔淨不變，兩人蓋以此相勗。繁華都市中的樓居，遺老「詩眼」只見荒江之濱，壁燈昏冷。談至夜半，月光逐漸照亮深井闇室（「室闇夜氣澄，談深月樞爛」），嗣後，乍現宛如「冥契」（Mysticism）的一幕：「千秋罔象珠，灼爍窺光景。」那彷彿是美學藝術精神與宗教神秘體驗的合而為一，游心千古，談藝論道的極致，虛室生白，喚起光明。或有高歌驚鬼神。

在城中幽谷，遺老詩人以「魯陽揮戈」自勉，心存王事，入鼠穴而不驚不惑。夜半小齋，師友聲氣相求，議論風發，一時竟有光明破闇。沈曾植詩意的棲居，就在這一類「城市山水」的書寫中完成，它甚至可以超越客觀現實的限制與缺憾。從海日山居，一直到隱於井谷，率皆如是。儘管態度看似保守，這樣的書寫策略卻是新穎的。他思考過生活於新舊交融的空間中，自我存在的樣貌。

#### 四、街道：藏天下於天下

對於遜清遺老而言，上海租界是各股力量拉扯的空間，充滿衝突、顛覆。我們已看過繁華城市與枯寂淨土的並存。另一個更大的矛盾甚至危機，無疑存在華洋之間。上海租界畢竟為洋人有實無名之殖民地，國人不能無動於衷。如何消除此一惘惘威脅？莊子云：「藏天下於天下。」<sup>113</sup>

<sup>110</sup>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十四下，頁二四下。

<sup>111</sup> 《海日樓詩注》，卷10，頁1235。

<sup>112</sup> 《周易正義》，卷5，頁232。

<sup>113</sup>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三上，頁243。

### (一) 麥根路 (Markham Road)

1912年陰曆七月，沈曾植遷居英租界麥根路，<sup>114</sup>自題寓所曰海日樓。滬上諸老中至少八人撰〈移居〉詩贈之，一疊四首，至於三和、五疊而不休。<sup>115</sup>九個月來流轉於直隸路、戈登路、虹廟街等寓所，萬事倉皇，如今正式遷居，同人賦詩不嫌複沓，一再往還，真不啻為洗禮、祓除。

〈移居〉詩中，偶亦有西洋物質生活痕跡，比如夏日食瓜，兼吹電扇。沈曾植〈移居〉其四「三白瓜來冰振齒，五明扇動電纏樞」，<sup>116</sup>對仗頗工，是新文明融入舊詩詞的佳句。但觀覽遺老們〈移居〉全體詩境，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古典生活。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海日樓方向與空間的量度，似有相對、不確定之特性。沈曾植〈移居〉四首其一，落句借方位申「尊周」意：「不用指南重審度，景公夕室是西偏。」<sup>117</sup>梁鼎芬和詩押「偏」字，云：「幾日新居將識路，茶仙亭子在西偏。」<sup>118</sup>這一特徵背後，舊詩語的血脈鮮明。東坡謫僑，怎樣識路？「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sup>119</sup>

只是，上海都會已非古典城市。城中有縱橫交錯的馬路、橋樑，供人尋覓；家居編有住戶號碼，精確不移。西方文明影響下，居所各有其位，再不必乞靈於樹木、牌坊、廟宇。清末鄉間仍然沿用的那一類尋路方法，如鄭孝胥歸里，指點輿夫：「入梯雲里，過貞壽坊，遙見荔枝樹下有門者，是吾家也。」<sup>120</sup>三十年後上海一地，羅振玉致函王國維，已改問：「遜老〔沈曾植一號遜翁〕所居，究係幾號門牌，祈示知。」<sup>121</sup>門牌不只便於尋路，一旦號碼差池，消息往來亦多遷延。王氏另有函致羅振玉：「維之地址，多誤書三百五十二號。此次之電因地址誤，稍稍時刻。請告君楚以後當書三百九十二號為妥也。」<sup>122</sup>毫釐千里，一字誤不得也。

<sup>114</sup> 麥根路為今上海石門二路（新閘路以北段）。見吳健熙（編）：〈舊新路名對照表〉，載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卷，頁198。

<sup>115</sup> 見聞所及，沈氏〈移居〉詩有樊增祥、陳三立、梁鼎芬、吳慶坻、吳士鑑、沈瑜慶、王仁東、楊鍾義之和作，且一人不只一疊四首。如沈曾植〈綱齋和詩偉麗綿密老夫讀之縮手歎息三疊奉答並示留坨〉四首，詩題一作〈樊山三和移居詩五疊韻答之〉。見《海日樓詩注》，卷4，頁477。

<sup>116</sup> 《海日樓詩注》，卷4，頁474。

<sup>117</sup> 同上注，頁473。

<sup>118</sup> 梁鼎芬：〈乙庵移居詩和韻同晚晴散原四首〉，載《海日樓詩注》，卷4，頁476。

<sup>119</sup> 蘇軾：〈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其一，載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42，頁2322-23。

<sup>120</sup> 《鄭孝胥日記》，1882年4月17日，頁2。

<sup>121</sup> 〈羅振玉致王國維（1916年4月14日）〉，載《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59。

<sup>122</sup> 〈王國維致羅振玉（1916年12月12日）〉，載《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207。

麥根之名，得於英人。<sup>123</sup>當時，此路是公共租界中的重要幹道。沈氏來居之時，麥根路上已有電車奔馳。上海電車開通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不久後已八線齊發。<sup>124</sup>另據時人郁慕俠記載，電車起初的路線很少，「只有一路和三路」，「東新橋到麥根路」居其一也。<sup>125</sup>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租界，電車，英人路名，曾植所居真洋場也。惟其如此，〈移居〉詩句刻意模糊此樓位置，才更加引人注意。尤有甚者，麥根路名，來自英人John Markham (1835–1871)。麥氏曾任英國駐上海副總領事(British Vice-Consul General in Shanghai)，並於1863年6月至1865年3月權攝總領事位。麥氏親族中大名鼎鼎的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爵士，與中國頗有淵源。<sup>126</sup>斯氏曾在1793年佐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來華覲見清帝，並有名著《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傳世。馬、斯等人西來，清帝國日正當中；不及百年，而遷謝遄速。到了麥氏及其繼位者任總領事之世，已可以外人之身、居一隅之地，繫中國輕重，沈氏自當點滴心頭。<sup>127</sup>

且看遺老詩人「用夏變夷」手段。<sup>128</sup>沈曾植移居麥根路後不久，馮煦(1842–1927)也遷居附近。沈氏賦詩贈之，即取麥根一名大作文章。詩題〈蒿庵中丞近寓麥根路橋西，相去不百步，余以病未能祇謁也，近取〈離騷〉「攬木根以結茝」句，易書麥根曰木根。詩亡字在，感喟同之〉，曰：

渾敦乃忘天，橫流已無地。露車適蒼莽，吾駕將焉稅？獨立風太寒，獨居鍵善閉。愛此木根名，騷經著文字。書之貝葉牋，結以枯蘭佩。寂寥芳草心，

<sup>123</sup> 錢注：「麥根者，英人，取其姓為路名。」《海日樓詩注》，卷5，頁709。

<sup>124</sup> 詳參王心：〈上海華商有軌電車誕生始末〉，《交通與運輸》2014年第6期，頁75–76。

<sup>125</sup> 郁慕俠：《上海鱗爪》，頁46。郁慕俠(1882–1966)民初上海記者。本文所引郁書為1998年上海書店本，原係1933年上海滬報館出版。1908年上海電車開通，郁氏27歲，其親身見聞珍貴可信。

<sup>126</sup> Paul French, *The Old Shanghai A–Z*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33. 麥氏於1863年6月6日就任代理領事，見《上海外事志》編輯室(編)：《上海外事志·各國駐滬使領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頁269。

<sup>127</sup> 庚子拳亂之時，英政府曾授意駐滬總領事知會張之洞、劉坤一諸督維護秩序，如果他們「採取了維護秩序的方法」，他們將受到英「帝國海軍的協助」。英方要求「水師過滬時，切勿阻攔，並給予方便」，並會同各國與東南當局簽署了《東南保護條款》及《保護上海租界城廂內外章程》十款。見《上海外事志》，頁207。「畫保東南約」一事，沈曾植有大力焉。當日英人權勢，局中人當知之。參見王蘧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頁36–37。

<sup>128</sup> 《孟子·滕文公上》：「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注疏》，卷五下，頁175。

千秋萬年繫。胡繩纏菌桂，遺則言如對。有客倚檻觀，春申指林際。蕭然黃葉徑，中有芝蘭氣。皋伯廡已隘，洪厓居數徙。連牆薜荔蕊，永言同臭味。我頃賦移居，夷則么絃比。君今爰集茲，五噫寧無紀？蒼蒼暝色上，杳杳歸人至。有身容膝老，無語搥牀睡。蹇步未叩門，矢詩舒黷呬。<sup>129</sup>

詩題中所及的〈離騷〉句子，作「擘木根以結菝兮。」注曰：「木根與菝皆喻本也。」<sup>130</sup>木根，無香無色，樸拙無奇，屈子借此自明忠信，不為華飾之行。曾植「易書麥根曰木根」，藉由譯音的草木之殼，賦予「麥根」中國傳統文明之實。洋場風華，詩人抽換一字，一瞬驅而散之。

本詩開篇寫無天無地之悲歎，老人鍵戶獨居，猶可以不憂，因為：「愛此木根名，騷經著文字。」靈均芳草之心，千古同感。木根之名既出，以下旋接「書之貝葉箋，結以枯蘭佩。」此句大可玩味。沈曾植是民初數一數二的書法大家，書藝精湛。〈騷經〉文字，經歷閱讀，揀選，最後更要以書藝化為形體，這個賦義過程 (signification process) 才算真正告終。

那幾乎是一次驚心動魄的生命實踐。據門弟子王蘧常回憶，沈曾植雖刻意經營書法，卻始終視之為餘技，直至六十四歲後，始專意寫字。<sup>131</sup>推算年月，遷居麥根路時，沈氏已過六十三。不少學者認為，遷居上海對其書藝進展有大功。曾植書學，得筆於包世臣 (1775–1855)，晚年上窺晉帖、北碑，最後居滬，則致力臨摹甲骨、鐘鼎，及敦煌簡牘《流沙墜簡》，汲取其意、其神。沈氏指點後生：「摩流沙墜簡，當懸臂拓大書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sup>132</sup>詩中所云之「木根」，指不為華飾之行，返本，也當與這時期沈氏於書學的探索、造詣有關。龜甲牛骨，寧古與拙。返本並不承諾著安穩，沈氏書藝的「晚期風格」(the late style)，最在拙、生、不穩，「下筆時時有犯險之心」。<sup>133</sup>外在的動盪，似乎消融於內在求索。透過書法這一項藝術、美學實踐，一名詩人兼書家，試圖完整體現、呈現中國古典文明之精神與風姿；詩之小序，於是能自信地說：「詩亡字在。」

詩亡佚了，字猶在。一如古人面對斷碑刑碣，撫仰今昔，見證「詩亡石在」的滄桑。<sup>134</sup>由「麥根」而「木根」，「書之貝葉箋」；詩，凝縮成字，足以對抗時間洪流的滔

<sup>129</sup> 《海日樓詩注》，卷5，頁709–10。

<sup>130</sup>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2–13。

<sup>131</sup> 王蘧常：〈憶沈寐叟師〉，《書法》1985年第4期，頁18。

<sup>132</sup> 同上注，頁19。關於沈氏書藝之轉變，另可參田文惠：〈沈曾植避居上海對其書風轉變的影響〉，《書法賞評》2011年1期，頁60–64。

<sup>133</sup> 馬宗霍（輯）：《書林藻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與《書林紀事》同本），卷十二，頁四四四上。

<sup>134</sup> 宋人王仲敏〈次劉公遊虎丘韻〉：「詩亡石在雲徒恨，劍去池荒水自閑。」見厲鶚、馬日管（輯）：《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24，頁628。

滔滾滾。這自是「詩亡」的表層意義。更值得玩味的是，在古典語境中，它還指世運。《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sup>135</sup>周祚既衰，風人輟采，故曰「《詩》亡」。關於詩與世之浮沉升降，沈氏日後有歎：

濤園之言曰：宣王變正雅，侈中興，而變雅哀怨，亦唯此餘黎，遭際極艱而情蹙。周室大壞，與中興歲月距離，十餘年間事耳。……去今忽忽五六年，公歸天上，濤園亦反道山，校錄遺篇，疇昔之談，乃復棼輪浮溶於心目，悲夫！悲夫！世何自而有人，人何自而有知，寥廓宇宙間，復將焉置此四始六義之緒何等也？<sup>136</sup>

濤園，沈瑜慶（1858–1918）；公，瞿鴻禨（1850–1918）；兩老皆海上寓公也。周室中興十餘年而大壞云云，隱涉清末「同光中興」舊事。甲午戰事起，洋務運動之成果一敗塗地，清室迅速由盛轉衰；又不及二十年，而宣統遜位。沈氏謂中興已杳，吾友已逝，詩「四始六義之緒」無人聞問，將不知焉置。《詩》四始，詩理之至極也，「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sup>137</sup>興衰繫於君父。詩原來也是一種政教機制，關乎王化，及至帝制終止，第二層意義的「詩亡」，也就永不可作了。

曾植此文作於民國七、八年間，同人易代後徂謝，可與言詩者漸稀。此前，胡適剛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蔚為旋風。諸老揚名、安身的舊體詩詞，將被視為帝國的塵埃，掃入歷史角落。這，或許是又一層次的「詩亡」。從盛世不再，吾詩不傳，再到一個文學體裁的凋零，他無意間預見了一個無詩的未來。

還必須一辨的是，孟子繼云「《詩》亡然後《春秋》作」，<sup>138</sup>沈氏說「詩亡字在」。在這類似的句子結構裡，字，能否作為聖人筆削之續？曰否。沈氏書藝並不承載一國之大法，那毋寧迴向了一人一身而已。〈麥根路〉詩最後收在：「蹇步未叩門，矢詩舒隸嘔。」隸嘔，錢注引《爾雅》曰，息也。<sup>139</sup>賦詩題字已畢，君子息焉。民國十一年（1922）壬戌冬十月，沈曾植易簣前數小時，猶據案揮翰作楹帖，觀者咸謂：筆墨淋漓，精神不散。<sup>140</sup>師友門生五十餘人，作《海日樓絕筆楹聯題詠》。其中，王國維留題頗具代表性：

<sup>135</sup> 《孟子注疏》，卷八上，頁267。

<sup>136</sup> 沈曾植：〈瞿文慎公止庵詩集敘〉，載《海日樓文集》，頁66–67。

<sup>137</sup> 四始指「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見《毛詩正義》，卷1.1，頁22。

<sup>138</sup> 《孟子注疏》，卷八上，頁267。

<sup>139</sup> 《海日樓詩注》，卷5，頁710。

<sup>140</sup> 如馮煦題詠曰「神采奕奕，無衰颯象」，余肇康曰「淋漓元氣此靈魂」，汪詒書曰「精誠所積，貫徹生死」等，見沈頰（輯）：《海日樓絕筆楹聯題詠》，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年間稿本，無頁碼。

此書作於易簣前數小時，而氣象神采，煒煜如是，先生之視軀體，直傳舍耳。乘雲馭氣，無處不在——箕尾星邪？兜率天邪？肅觀遺墨，誰謂先生不在人間也？世有執神滅論者，請以此難之。<sup>141</sup>

事實上，王國維、羅振玉這對海日樓小友的往來書信中，早已用「麥根」二字代指沈氏。<sup>142</sup>當人、詩、字，合而為一，詩藝、書藝，不僅能安頓心神，「詩亡字在」（詩不傳，字跡亦將留存）；技，更能進乎道，或者應該說，「人亡字在」（精神與字合一，神不滅，與字同在）。

儘管時日及詩偕亡，而神不滅。沈曾植自己說來最貼切——「道窮詩亦盡，願在世無絕。」<sup>143</sup>

## （二）西摩路（Seymour Road）

海日樓西南隅，又有西摩路，沈氏日出入焉。西摩路即今陝西北路，<sup>144</sup>同樣以英人命名。麥根為英駐滬代理總領事，西摩則英國駐華海軍司令 Edward Hobart Seymour (1840–1929) 也。<sup>145</sup>海日樓鄰近路名源於夷人，一文一武，各為渠首。移居麥根路不久，沈曾植作〈西摩路〉詩，自注頗為善辯：

梵語悅意曰西摩，阿彌陀所居國土曰須摩提，文殊師利所居城曰蘇摩邪。釋義皆同。西、須、蘇，一字之異寫耳。稱意華曰須曼那，好意女曰西（一作「須」）彌迦。余所居地西南曰西摩路，不知邪寐尼書當作何解，中天語則悅意釋也。路為出入所必經，感此嘉名，彰以雅詠。<sup>146</sup>

詩云：

秋老物將息，羈懷藐何依。海濱常綠樹，慰我淮南悲。峻宇闕人迹，曠塗舒息吹。投林鳥有宅，脫挽車方歸。黃葉故槭槭，秋陽迴離離。欣然名字即，

<sup>141</sup> 同上注。

<sup>142</sup> 〈羅振玉致王國維（1916年12月17日）〉：「詳細辦法在致麥根書中。」麥根，即指沈而言也。見《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210。

<sup>143</sup> 沈曾植：〈簡蘇齋〉，載《海日樓詩注》，卷5，頁704。

<sup>144</sup> 吳健熙（編）：〈舊新路名對照表〉，頁193。

<sup>145</sup> 錢仲聯僅注曰：「西摩者，英國海軍將校。清光緒時，曾在遠東服務，西摩其姓也，取為路名。」《海日樓詩注》，卷5，頁701。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拳亂爆發，西摩率海軍進駐上海，保護英國商民。亂平後，上海僑民感念其貢獻，故以「西摩」冠名新路。見薛理勇：〈名門雲集的西摩路〉，《新民晚報》，2012年4月8日，B13版。

<sup>146</sup> 《海日樓詩注》，卷5，頁701。

已釋塵沙疑。老母米潘因，晚華曼陀姿。就體復不妄，無緣豫焉隨。遠見西南江，暮帆去何之？昭文琴可鼓，象罔珠方遺。<sup>147</sup>

詩人於篇首下一判斷：「梵語悅意曰西摩。」梵文字首“su-”有妙、善、極之意，*manas* 即「末那」，指意、思量；*su-manas*，即心中適悅之相。稱意華曰須曼那，指拘蘇摩花。此花一見令人心醉，故梵語亦為 *sumanas*。<sup>148</sup> 文殊嘗過蘇摩邪〔應為「那」〕城，城以花得名。<sup>149</sup> 以上三者，梵音相同，首字漢譯或翻為「須」，或翻為「蘇」，沈曾植將 *su-manas* 翻為「西摩」，並不精確。阿彌陀所居國土曰須摩提，須摩提，梵名 *Sukhāmātī* 或 *Sukhāvātī*，意譯為妙意、好意，指極樂淨土，讀法、寫法雖與 *sumanas* 稍異，但仍是好名。<sup>150</sup> 至於「好意女曰西彌迦」，則是英雄欺人之言。西彌迦，錢注闕。考佛經有外道曰西爾迦 (*senika*)，一作西尼外道，佛陀貶其為「淺智」，<sup>151</sup> 並非「好意女」。佛典中的好意女，當指善賢 (*Sumagadhi*)，舍衛城須達長者之女。善賢顏貌端正，廣為時人歎美，一般音譯多作須摩提、修摩提。<sup>152</sup> 如此一一羅列，可知「西、須、蘇，一字之異寫」之說，中原音韻也，以「西」翻譯代表妙、善的“su-”，向無此例。<sup>153</sup> 這裡，是為了切合「西摩」，挪借外道西爾迦中譯之一字，憑空捉來。

儘管音、意亦未必相關，但這項本領，路數堂堂正正。道咸以來，知識份子以音韻學中「對音」之法治西北輿地之學，收穫頗豐。沈曾植早年〈會試對策第五策〉論說北檄之事，論漢之「奄蔡」，「奄」與「阿」皆為喉音影母，「蔡」與「思」皆有撮音，蓋即元之阿羅思，今之俄羅斯也。又考「都魯機」為突厥遺種，「都突機厥，合音正同」。<sup>154</sup> 一代文宗翁同龢 (1830–1904) 大為歎服，贊為通人；連一向目無餘子、同榜

<sup>147</sup> 同上注，頁 701–2。

<sup>148</sup> 「俱蘇，此云悅也；摩那，意也。其花色美氣香，形狀端正，見聞之者，無不悅意。今此菩薩取之為名。」慧琳：《一切經音義》，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二二，頁四四五上。以上所引梵名，見釋慈怡 (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 年)，「喜」、「思量識」、「拘蘇摩」等條，頁 451、3810、3272–73。

<sup>149</sup> 釋慈怡 (主編)：《佛光大辭典》，「拘蘇摩」條，頁 3272。

<sup>150</sup> 同上注，「須摩提」條，頁 2608。

<sup>151</sup> 「佛告西爾迦言：我有甚深阿毘達磨，難見難覺，不可尋思。非尋思境，唯有微妙聰叡智者乃能知之，非汝淺智之所能及。」見玄奘 (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一，頁三上。

<sup>152</sup> 釋慈怡 (主編)：《佛光大辭典》，「須摩提」條，頁 2608。

<sup>153</sup> 檢閱《佛教漢梵大辭典》「西」字部，音譯名相，有「西迦羅」(*sakala*)、「西麻麻」(*simam*)、「西羯多」(*sekata, sagata, svagata*)、「西爾迦」(*srenika*)，沒有以「西」譯“su-”的例子。平川彰 (編)：《佛教漢梵大辭典》(東京：靈友會，1997 年)，頁 1053–54。

<sup>154</sup> 沈曾植：〈會試對策第五策〉，載《海日樓文集》，頁 233–35。

登科的名士李慈銘(1830–1895)，都不得不承認沈卷「視余作為精密矣」。<sup>155</sup> 沈氏的四裔史地之學，在歷經西潮挑戰之後，著作漸稀。惟一身本領仍在，於小碎篇章偶一發之，屢有奇論，如「安息即小亞細亞」：

安息之地，即小亞細亞也。安息為亞細之代音。<sup>156</sup>

又如「須彌山」：

佛書須彌山，即今希馬拉雅山也。西人稱此山中分亞西亞，故當為佛國第一大山也。<sup>157</sup>

除了經史、小學之外，佛書亦為此老所驅遣。沈曾植以一音說法，仙佛不禁；倚仗對音之技，能窺破世界兩大宗教同源之秘。沈氏僅依審音辨名，考得「回教自謨罕默德以上，與天主教同出一源」；而阿丹(今譯亞當)以降，回教始祖七人，「皆天主教內不祧之大宗」。<sup>158</sup> 儘管仍有些許誤判，但已與現代學者認知之宗教史圖像大致吻合。<sup>159</sup> 然則傳統對音之法，豈容輕忽哉？

應該如此說，對音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有時不免以目的先行。如章炳麟(1869–1936)為宣傳排滿，斷中國種性出加爾特亞，即葛天氏也；神農為薩爾宮一世(Sargon I, 2369 B.C.–2314 B.C.)，黃帝為埃蘭族部落之首，率眾東遷云云。<sup>160</sup> 太炎的對音之說頗有罅漏，<sup>161</sup> 一如沈曾植說解「西摩」，有著隨意性、聯想性，充斥詩意的想像。後輩學者夏承燾(1900–1986)對沈氏之率爾操觚，即有不滿：

<sup>155</sup> 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頁37引沈曾植〈序元聖武親征錄校本〉：「常熟尚書尤重沈卷為通人。」〈序元聖武親征錄校本〉，許全勝、柳岳梅(整理)《海日樓書目題跋五種》(頁145–46)作〈聖武親征錄校本跋〉。又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頁40引李慈銘評語，見李慈銘：《苟學齋日記》，收入《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12冊，卷乙上，頁8845。

<sup>156</sup> 沈曾植(撰)、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3，「安息即小亞細亞」，頁111。

<sup>157</sup> 同上注，「須彌山」，頁110。

<sup>158</sup> 同上注，卷6，「回教天主教同出一源」，頁266。

<sup>159</sup> 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共同根源，論者多矣，惟沈曾植判斷亞當(阿丹)以下七人為兩教「不祧之大宗」，則有微誤，蓋「穆斯林的世系追溯到易卜拉欣的僕妻哈哲爾所生的兒子伊斯瑪儀，而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則追溯到亞伯拉罕合法妻子薩拉所生的兒子」，其中仍有大宗、小宗之別。見弗朗西斯·魯·賓遜(主編)，安維華、錢雪梅(譯)：《劍橋插圖伊斯蘭世界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導言〉，頁13–14。

<sup>160</sup> 朱維錚、姜義華(編譯)：《章太炎選集(注釋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07–9。

<sup>161</sup> 章太炎宣稱「薩爾宮為神農，古對音正合」，學者註釋章氏〈序種性〉一文，指出其謬：「薩爾貢一字，阿卡德語為 *sharruken* (沙魯金)，意思是『真正的王』，同中國的神農氏，音既不對，意也不同。以下多類此，不再一一分辨」。見《章太炎選集(注釋本)》，頁209–10。

仲聯方注海日樓詩，其中有西摩路一首，即上海英租界路名。眉孫謂西摩本英海軍軍官之姓，曾來上海，故英人取以名路，與戈登路、霞飛路同義。寐叟詩序亦附會佛典解之，其改麥根路為木根路，亦同可笑。其治元史地理，若一循此法，則危險滋甚。<sup>162</sup>

夏氏堅持的是學術態度，研治四裔史地，要求嚴謹。然而，形與音，本為承載意義的銘刻、祕響。我們不該忘記，上古文字解讀中最有創造力的說法之一，即來自詩人想像之辭；而治甲骨、金文卓然有成者，多為一流詩人，「詩的想像和史的想像之間似乎存在著一道互通往來的橋樑」。<sup>163</sup>透過詩意的建構，對音之技，足以成為遺老詩人馴服西洋之術——英國駐華海軍司令，竟爾成了一聲令人愉悅的好音。

沈曾植〈西摩路〉：「欣然名字即，已釋塵沙疑。」塵沙疑，出典固為天台三惑之一，「障礙俗諦之事智」；<sup>164</sup>塵沙又可指戰亂，不得不令人思及「塵沙沒中原」的庚子年（1900）。<sup>165</sup>庚子拳亂初起，英將西摩於6月10日率軍北上受挫，才有17日列強奪大沽口之役，戚其章因視西摩出兵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開始的標誌」。<sup>166</sup>聯軍入京，兩宮逃竄，情勢幾乎不可救。西摩後來領軍南下，護衛上海洋商，路因得名。根據其自傳，上海商界對他的庇護十分感念。<sup>167</sup>對中國而言，西摩入滬，後患無窮。英兵上岸，除可能驚擾商民，多生事端，更要預防的後著，是「胡來不覺潼關隘」<sup>168</sup>——英人藉口內地有匪，調兵直趨長江。西摩南下，引起盛宣懷（1844–1916）、張之洞（1837–1909）、劉坤一（1830–1902）等人的高度警覺。諸人不斷設法阻止，又聯合

<sup>162</sup> 夏承燾（著），吳戰壘、陳慶惠、鄭小軍（整理）：《天風閣學詞日記（二）》，收入《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冊，1940年2月17日，頁179。

<sup>163</sup> 如郭沫若考湯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當為「兄曰辛，祖曰辛，父曰辛」。詳郭沫若：〈湯盤孔鼎之揚榷〉，載郭沫若：《金文叢攷》（出版地不詳：株式會社開明堂，1932年），頁81–87。余英時認為郭釋「其實這只是一個永遠不能證實、也無從否證的猜測，但是他從想像力而生的巧思也由此可見其一斑」。余氏又申論治甲骨、金文卓然有成者，多為一流詩人如王國維、郭沫若、聞一多、陳夢家等，「這個現象決不是偶然的巧合，詩的想像和史的想像之間似乎存在著一道互通往來的橋樑」。見余英時：〈談郭沫若的古史研究〉，載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頁105–7。余英時說法頗可與本文所論相印證。余說只追溯到王國維，事實上，王氏論古文字，得自沈曾植啟發者不少，一流文字學者兼一流詩人，應再加上曾植一人。

<sup>164</sup> 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一心三惑」條，頁22–23。

<sup>165</sup> 「塵沙沒中原」，明遺民顧炎武歎息神州陸沉語。此句原鈔本作「胡塵沒中原」，後避清人眼目而改。沈氏所見，當為「塵沙」。見顧炎武：〈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載華忱之（點校）：《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1，頁279。

<sup>166</sup> 戚其章：〈論庚子大沽口之戰〉，《近代史研究》1997年1期，頁116–30。

<sup>167</sup> Edward Hobart Seymour, *My Naval Career and Travels* (New York: E. P. Dutton, 1911), p. 374.

<sup>168</sup> 杜甫：〈諸將〉，載《杜詩詳注》，卷16，頁1365。

法、美各國領事施壓。可惜斡旋無功，終於讓西摩軍隊駐入上海。宣懷痛心疾首，「滬市全壞，無計挽救」。<sup>169</sup>沈曾植當時正在南皮幕下，為促成中外互保之策，奔走東南諸大僚間，必定熟知其事。再依《春秋》例，「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逆也。<sup>170</sup>十多年後重見「西摩」，詩人怎能不驚惑？所幸，西摩名字可喜。掏空路名原義，留下音聲，疑滯可銷。此句有內典，「名字即」者，於名字中，知一切法皆是佛法者是也——譬如稱梵語西摩之為悅意。天台所設化法四教，也是學者的修為進境，若觀一心即空，即假，即中，自可破盡塵沙無明障。詩最後收在：「昭文琴可鼓，象罔珠方遺。」兩句皆反用《莊子》典。象罔得珠，出自無心；<sup>171</sup>昭文不鼓琴，無成，所以無虧；<sup>172</sup>似亦彰顯三諦之「中」義。圓成實性，妙一切法；琴可鼓，珠可遺，路有嘉名，無入而不自在。（如僅依字面讀，「象罔」、「昭文」，亦正合〈麥根路〉詩所云「詩亡字在」。）

英帝國駐滬總領事麥根、駐華海軍總司令西摩，文武兩大僚。沈曾植面對著海日樓旁兩馬路，同時面對著一個強大的他者。但，又何須視為「畏途」？或許就在這樣詩性的調適與轉化中，在老人自足的精神世界裡，他得以馴服了「大門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sup>173</sup>——儘管那似乎有幾分阿Q精神，實質上對於巍巍的殖民者，未曾動搖分毫。

### (三)命名之必要

如果始終不曾動搖現實，詩人是否有必要調度如此龐大的文明資源，改換路名？至少在當時人們心中，路名是重要的。民初租界內的馬路多以西方人冠名，曾引發當地居民的不安。成長於天津的愛潑斯坦 (Israel Epstein, 1915–2005) 回憶，租界通衢，

<sup>169</sup> 盛宣懷：〈寄劉峴帥〉，載盛宣懷：《愚齋存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卷三九，頁一上。參盛氏1900年7月諸電報文，可知此事前後脈絡。諸人折衝其間，煞費苦心。同前書，卷三八至三九。

<sup>170</sup> 胡安國（著）、錢偉疆（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頁7。

<sup>171</sup> 《莊子·天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五上，頁414。

<sup>172</sup> 《莊子·齊物論》：「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一下，頁74。

<sup>173</sup> 典出Frederic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高懸著外國侵略者之名，生活於斯，「等於每天都在心靈上受到侮辱」。<sup>174</sup>此外，更深層的恐懼，來自夷夏之防：

租界各馬路在公共租界者，大率以中國行省及內地著名城市命名。在法租界者，大率以該國著名人物命名。而中國人對於兩租界之馬路，亦各名有中國之名。……數年前，新築之路，若愛爾近路，若卡德路等，則已無中國之名矣。此事雖小，頗與同化、被同化之實例可相參究。吁！可畏已！<sup>175</sup>

英、美公共租界中，道路本以中國行省、城市命名，如沈氏曾短暫住過的直隸路、威海衛路。幾年下來，兩租界馬路命名漸漸從中式地名過渡到西洋人名，夷狄亂華，莫之遏也。人們在此窺見了同化危機，文明劫毀。

名稱帶來的危機感，已是國人的集體意識。在華洋雜處的十里洋場，沈曾植疾首於「歐華揉合」之弊，語帶激憤：

近世歐華揉合，貪嗔癡相，倍倍增多，曰路德之嗔，曰羅斯伯爾之嗔，曰托爾斯泰之嗔，曰馬克斯之嗔；吾國天性主讓，而近世學說貴爭，既集合上四者而用之，變其名曰專制之嗔，官僚之嗔，軍閥之嗔，資本之嗔，又為之枝葉曰涼血之嗔，曰不順潮流之嗔，曰迷信之嗔，曰頑舊腐敗之嗔，曰民智不開之嗔，廣張八萬四千鈞，而吾華四萬萬民，無一非可嗔之物矣！<sup>176</sup>

思想上，西風壓倒東風的「怪現狀」，廣張八萬四千鈞，令一代新人都成了舊人（李白原作「三千六百鈞」，<sup>177</sup>沈氏易以佛家浩瀚之數，見其不思議）。抱持這樣的心境，遺老詩人棲息於市街一椽，屋旁兩路，又正是「歐華揉合，貪嗔癡相」的具體呈現，未免不堪。租界割讓，道路得名，要歸因西方船堅砲利之至剛，而麥根、西摩二氏，即係英國駐華最高行政、軍事長官之一。由是觀之，此處夷夏駢羅，不止「揉合」而已，除前述同化的威脅，它還時刻提醒出入者，英人越俎代謀、入室操戈的切身危機。

<sup>174</sup> 根據訪問人員的記載，愛氏回憶當年在天津生活的情景，「在天津租界裡，有不少街道是以外國侵略者名字來命名的，如埃爾津路、戈登路、西摩路。他認為，這種現象對住在這片土地上的『我們』，等於每天都在心靈上受到侮辱」。張帆：〈愛潑斯坦90北京胡同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程〉，載中國地名研究所（編）：《中國地名研究論文集（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年），頁78。

<sup>175</sup> 姚公鶴（著）、吳德鐸（標點）：《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4。

<sup>176</sup> 沈曾植致金蓉鏡書，見王蘧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頁75。

<sup>177</sup> 李白〈梁甫吟〉：「廣張三千六百鈞，風期暗與文王親。」見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3，頁210。

租界內外，一樣「必也正名乎」。<sup>178</sup>當時，民國轄地雖緊鄰租界，但不能逾西人雷池一步。當局遂拆租界以南之上海城牆，分段命曰「中華路」與「民國路」，政治宣示的意涵十分明顯。<sup>179</sup>改名又不須經政府之手，葉德輝（1864–1927），前清官吏，遜帝復辟支持者。民國元年秋，他有一段「光復坡子街」軼事：

黃興歸，當路迎至德潤門，改為黃興門；道出其故居坡子街，並改為黃興街。君命掃街夫撤去，戲作〈光復坡子街記〉，語多諧謔。當路憤甚，拘之至警廳，觀者千人，劫之出，護送至某洋行，乘輪船避上海。<sup>180</sup>

葉氏〈光復坡子街地名記〉縱橫古今，嬉笑怒罵，至欲「呼黃興為坡子街，不當改坡子街為黃興」，<sup>181</sup>除貶低革命黨魁，背後實有各方勢力相角。權力架構轉變下的糾葛，具體而微地呈現在一條黃土街名上。<sup>182</sup>文人當道命名，往往最具象徵意義及魅力。

居滬遺老面對洋化路名，或許著眼於新奇，頗有為賦詩歌者，只是手段、心境，未必全同於沈。陳夔龍（1857–1948）〈過西摩路口舊宅七疊前韻〉首二句：「補巢重見燕銜泥，行過西摩路轉西。」<sup>183</sup>用一「西」字等閒過渡，竟不措意於背後西人的威脅。楊鍾義居住的茄勒路（Rue Galle），乃 Paul Edouard Galle（1835–1879）之譯音。茄勒氏，法籍名醫，兩度出任法租界最高行政機構公董局董事，亦一時權要也。<sup>184</sup>樊增祥、梁鼎芬（1859–1919）等人碎拆其名，以每字冠首，戲賦為詩，楊鍾義、吳士鑑（1868–1930）亦有和作。<sup>185</sup>眾人詩作面貌，可以樊山〈髯翁徵詩戲賦（時留坨徙茄勒路順元里北弄，髯以每字冠首索詩）〉為例：

<sup>178</sup> 《論語·子路》：「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93。

<sup>179</sup> 薛理勇：《上海地名路名拾趣》（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頁138。

<sup>180</sup> 佚名：〈葉卮園事略〉，載汪兆鏞（纂輯）：《碑傳集三編》（香港：何氏至樂樓，1978年），卷41，頁2209–10。

<sup>181</sup> 〈葉德輝賈禍之文章：光復坡子街地名記〉，《時報》，1913年6月17日，第5版。

<sup>182</sup> 詳參黃永豪：〈坡子街上的對抗：二十世紀初年城市與國家建構初探〉，《歷史人類學學刊》第3卷第2期（2005年10月），頁89–130。

<sup>183</sup> 陳夔龍：《花近樓詩存》，收入王偉勇（主編）：《民國詩集叢刊》，第35冊，卷一，頁四三上。

<sup>184</sup> Paul French, *The Old Shanghai A-Z*, p. 201. 茄勒氏之任公董局，見《上海租界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表」，頁661。茄勒，該表譯為「加爾」。

<sup>185</sup> 楊鍾義：〈身雲以鄙寓「茄勒路順元里北弄」八字冠首為詩，綱齋亦有和作，賦此示綱齋〉，載楊鍾義：《聖遺詩集》，1935年鉛印本，卷甲，頁二三下。

茄荷隔浦作新秋，  
 勒住斜陽緩下樓。  
 路粹有文傷鏤刻，（指近日事。）  
 順郎讀曲自風流。（昨夕顧曲。）  
 元譚喜入光風座，  
 里耳難諧白雪謳。  
 北夢有言殊瑣瑣，  
 弄花掬水足清游。<sup>186</sup>

樊增祥等大作手拆散、收納西洋名號，冠於七律句首，鑲嵌片斷，呈現出相對穩定的秩序感。惟此一拆，徒令舊意義消散，新意義並不隨之挺立，出三昧而未入三昧，遊戲足矣，略欠神通。

相較之下，海日樓主人袖裡乾坤廣大，從拆解樓居，散歸自然，賦詩放光，破除瘴氣；到最後收納西洋人名、路名（及背後代表的征服與城市文明），彌縫於中國傳統典故、意象中；透過意象接駁（「麥根」而「木根」）、聲韻對音（「西摩」與「悅意」）等傳統舊詩技巧，復以各種美學實踐（繪畫、書法）體現、呈現出一華洋層疊的空間幻境。命名是人們觀看、感受、想像，而後進一步表達世界的方式。沈曾植曾有句：「題作蕭齋地即佳。」<sup>187</sup>錫以嘉名，賦為詩歌，詩人心志因能曲折繁複地折射、凝縮，等待讀者詮釋。隨著作者完成一遍「充滿勞績」的創作歷程，我們可以發現，身兼詩人、書法家、虔誠佛教徒的沈曾植，竟如此自覺化合一座陌生異質之都市，微妙地馴服了他者，藏夷於夏，藏天下於天下。

在充滿最新思潮，最新建築、娛樂、器用的國際大都市中，以沈曾植為渠首的遜清遺老詩人，卻詭麗地迴旋轉身——並且挾持著巨大的文明資源，如佛經云，象王迴身——多少退縮到了一己心安之境。新人、新物，蔽天而來。世界倏忽遷轉，吾心猶能安居於自我「存在」的小樓、於一首詩中。雖然現實中的惘惘威脅不曾斷絕，一如復辟那年沈寓被人拋進炸彈，巨響猶在耳際。<sup>188</sup>惟是，艱貞地安頓於中國式意義體系下，亦即安住此世了。

夢方遠，麥根路沈寓外有電車星馳。

<sup>186</sup> 樊增祥：《樊山集外》，卷3，頁1846。

<sup>187</sup> 沈曾植：〈樊山錄示移居詩依韻奉和詩〉，載《海日樓詩注》，卷5，頁617。

<sup>188</sup> 上海作為各方政治勢力進駐之地，遺老們飽受威脅與騷擾，自不待言，報端時時可見。1917年沈曾植北上參與張勳復辟，麥根路寓所被人投擲置炸彈，即是其中鮮明一例。見〈沈曾植家發生巨聲〉，《申報》，1917年7月11日（第15950期），第10版。

## 六、結語

清帝遜位，民國建立。從上海到海上，城名宛如一聲咒語，遺老們將其意義凝縮，對抗城市、物質與欲望。遜清遺老避入上海租界，儘管不乏「摩登」生活，眾人詩文中卻保持著遺民的理想樣貌，無聲無臭。只有在一句詩語的曖昧縫隙中，讀者才能偶然瞥見他們面對現代性的兩副面孔：享受與淡漠。上海的速度與能量實有文字縛不住者。

身為遺老中詩藝精湛者，沈曾植以詩消納上海的聲色與欲望，調和城市生活的緊張與不安。透過「詩眼」觀照，他因能將市塵居擬作山居，藏城市於山林；而藉由驅遣中國文明龐大資源，沈氏更得以馴服西洋威脅，藏夷於夏，藏天下於天下。清遺老在上海，並非一味自我限縮，藉由詩詞的書寫，加上書法、繪畫等藝術實踐，反而能夠擴充心境。正是有了這拓開的時空，他們才得以安居其中，悠遊於繁華城市與枯寂淨土的並存之所。

晚清南來香江的中國文人，從擁擠的居室步下高樓，不也能在路口指認英帝國殖民者之名？1940年代後，乍見縱橫於臺北街道路牌上的中國行省、都市，成長於日式教育下的在地文人，當亦有「今夕何夕」的危機意識及荒謬時代感。同樣面臨時空斷裂、空間錯置，來自香港、臺灣、南洋，甚至走向南方之南的不同個案，那些自我放逐、遷移、離散者，將如何透過書寫與新生活的經驗交接、互動？<sup>189</sup>看過遺老詩人與「現代」短兵相接的例子，「沈曾植在上海」帶來的啟示，想來不會及身而止。

---

<sup>189</sup> 高嘉謙針對相關個案有極精彩的分析及論述，見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 詩意地安居 —— 沈曾植的晚年上海生活與滬上遺老詩歌寫作

(提要)

陳建銘

民初上海租界，既是中國最現代化的繁華都會，又以政治因素，成為遜清遺老的逋逃藪。斯人斯城之間，充滿矛盾與張力。清遺老的上海生活與城市詩作書寫，面目獨異，精采絕倫，是「上海摩登」之外一章。他們屢屢援引中國傳統文明之知識、典故、技藝，介入書寫；而書寫與實踐，最後又反過來定義了他們自身，定義世界。

面臨文化衝擊，中國傳統文人憑仗文字與詩，嘗試安頓、回應劇烈的矛盾。身為清遺老中詩藝精湛者，沈曾植(1850–1922)即擅長以詩歌消納上海聲色，調和現代城市生活的緊張與不安。透過「詩眼」觀照，他能將市塵居擬作山居，藏城市於山林；而藉由驅遣中國文明之資源，沈氏更得以馴服上海無所不在的外文譯音路名，藏夷於夏，藏天下於天下。細讀沈曾植及其同人的創作，我們可以發現：遜清遺老在上海，並非一味自我限縮，藉由詩詞書畫等藝術實踐，他們反而能夠擴充心境。正是有了這開拓了的時空，遺老才得以安居上海，悠遊於繁華都市與枯寂淨土並存之所。

**關鍵詞：** 上海 租界 清末民初 清遺老 沈曾植

# Poetic Dwelling: Qing Loyalist Poet Shen Zengzhi's Final Years in Shanghai

(Abstract)

Chen Chien-Ming

Shanghai was a most modern c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d a haven for Qing loyalists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There were tens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modern city and its conservative residents. To seek a reconciliation, they used their traditional Chinese resources in poetry writing, which, in turn, reconstructed and reinforced their self-identity.

Shen Zengzhi (1850–1922) wa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cases, for his writings are considered by many literary critics to be among the greatest by Qing loyalists. Through a poet's vision, Shen resolv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rban experience and the reclusive life. He viewed the towering buildings as mountains in his works, appropriated the translated street names in the poems "Markham Road" and "Seymour Road," and finally, accommodated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Chinese one. Through a closing reading of Shen Zengzhi's poetry, this paper aims to break the stereotypical impression regarding the Qian loyalists. These cultural conservatives did not live a self-restricted life in the bustling and hustling Shanghai city. Instead, their artistic practices helped them ease their state of mind. Looking beyond the material realm, the Qian loyalists could at last settle in a place where a waste land coincides with a pure land.

**Keywords:** Shanghai    foreign concession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Qing loyalists    Shen Zengzhi